

重慶

地方志

2026 02

总第37期(季刊)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志鉴研究

· 文史纵横

· 地情揽胜

· 工作动态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第十五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在重庆举办

2026年5月19—20日，第十五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在重庆举办。中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志办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邱新立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西南大学省委常委、副校长邹芙都，重庆市志办主任何晓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重庆市志办副主任徐斌主持闭幕式。

开幕式上，陈文学总结了近十年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效，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五点要求：一是锚定政治引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方志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二是抓实三轮修志，破解编纂质量重难点问题；三是突出地方志特色，推进方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四是借力人工智能，创新方志理论与编修方法；五是深耕年会品牌，持续提升全国学术年会办会质量。

陈文学强调，要以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5·17”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大思想武器，坚定治学方向、强化理论自觉，推动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融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方志研究服务新时代哲学科学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

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特聘教授赵世瑜、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仙、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蓝勇，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何晓栋，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刘汉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自强，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紫升等专家先后作专题演讲。会后，与会人员分组开展交流研讨。

闭幕式上，邱新立总结了本次学术年会的特點，并就全国地方志工作顶层设计，推动第三轮修志工作，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志书的资料性、著述性、可读性，如何科学、合理利用人工智能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本次年会由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地方志》期刊编辑部协办，西南大学、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庆市地方志学会承办。年会受到全国地方志系统及4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关注，共征集论文700余篇，经专家匿名评审，入选参会论文90余篇。

（摘自方志中国）

责任编辑：张 莉





《重庆地方志》编委会

主任：何晓栋
 副主任：徐斌
 委员：曾伟 司逸澈 郭永彬
 董宁波 熊蜀黔 夏吉敏
 陈伟

《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徐斌
 执行主编：熊蜀黔
 执行副主编：陈伟
 编辑：周怡彤 张莉 陈欣如
 校对：黄仕洁 邱雨婷

主办：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四支路
 4号信一金典4楼
 邮编：400020
 联系电话：023-89075121
 电子邮箱：cqdfz2017@163.com
 印刷：重庆巴南彩印厂
 准印证号：(渝) 2025700

目录

CONTENTS

志鉴研究

第三轮修志如何提高志书的可读性 杨富中 (2)

试论地方综合年鉴生态部类框架的设置 王志迁 (12)

方志馆建设要着力突出方志特色 杨立宇 (19)

文史纵横

丹心照虎城 实绩惠民生 田伊格 (26)

国家级非遗铜梁龙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苏其善 (31)

綦江僚人文化：历史传承与方志意义 王凤琳 周铃 (40)

地情揽胜

两路口的跳伞塔 强雯 (49)

一座千年古城的搬迁始末 陈朝权 (54)

身边的铺递 叶仁军 (62)

工作动态

第十五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在重庆举办 封二

重庆市地方志系统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圆满结业 封三

第三轮修志如何提高志书的可读性

杨富中

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特定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资料性文献，承载着传承地域文明、记录时代变迁、凝聚乡土情怀的重要使命。《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第三轮修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承载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征程的重要责任。

可读性指志书以科学的体例、生动的内容、通俗的表达、多元的形式，满足不同受众阅读需求，实现“看得懂、愿意看、用得上”的核心特质。长期以来，部分志书陷入“重史料、轻阅读”“重规范、轻表达”的误区，体例呆板、语言枯燥、内容堆砌、形式陈旧，导致“编完即束之高阁、出版即无人问津”，严重制约方志功能的发挥。第三轮修志恰逢数字化时代、全民阅读时代，受众阅读习惯从“深度精读”向“碎片化阅读”转变，传播载体从纸质文本向全媒体拓展，若仍固守传统模式，必将脱离时代、远离大众。

提高志书可读性，并非弱化史料真实性、降低编纂规范性，而是在坚守“存真求实、述而不论”核心原则的基础上，优化编纂逻辑、丰富表达形式、贴近受众需求，实现权威性与可读性统一、专业性与通俗性兼顾、史料性与实用性结合。本文基于前两轮修志实践反思，结合第三轮修志时代要求，系统探析提高志书可读性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为第三轮志书编纂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第三轮修志提高志书可读性的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

（一）可读性是方志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地方志兼具资料性、权威性、群众性三重属性，资料性是根基，权威性是保障，群众性是归宿。志书的价值不在于编纂完成，而在于传播使用；不在于馆藏完备，而在于大众认同。可读性是连接方志与群众的桥梁，是实现群众性的核心载体。古往今来，优秀方志无不

兼具史料价值与阅读魅力，南宋范成大《吴郡志》、清代袁枚《江宁县新志》等经典，以文辞典雅、叙事生动、图文并茂流传至今^①，成为“文质兼美”的典范。如河北某县首轮修志中，《风物篇》因语言平实、记载乡土掌故较多，在当地群众中流传较广；而纯政务、纯数据篇章则长期闲置^②，直观说明可读性直接影响志书生命力。新时代方志若失去可读性，便失去了传播力、影响力，最终沦为“尘封文献”，背离“资政、存史、教化”的初心使命。

（二）可读性是第三轮修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第三轮修志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精品佳志的标准不再局限于“门类齐全、资料翔实”，更涵盖“体例科学、语言生动、形式新颖、可读性强”。相较于前两轮修志，第三轮修志面临更丰富的时代内容、更多元的受众需求、更先进的技术支撑，具备提升可读性的坚实基础。提高可读性，是破解前两轮修志“千志一面、枯燥乏味”困境的关键，是推动方志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的核心举措，更是衡量第三轮修志成败的重要标准。如江浙等地试点三轮志书，因增设民生故事、图文板块、数字二维码，读者使用率较二轮志书提升

明显。

（三）可读性是方志服务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赋予地方志“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使命。提高志书可读性，才能让方志走出方志系统、走进社会大众：对党政干部而言，可读的志书能直观呈现地情规律，为决策提供精准参考；对专家学者而言，可读的志书能高效整合史料资源，为研究提供便捷支撑；对普通群众而言，可读的志书能唤醒乡土记忆，为文化认同提供精神滋养；对青少年而言，可读的志书能传承地域文明，为思政教育提供鲜活素材。如邯郸市在二轮修志完成后，积极推进方志成果转化与普及工作，将厚重的志书内容简化改编为乡土教育读本引入中小学课堂，显著提升了青少年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接受度；同时依托方志网站、“方志邯郸”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地情知识，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强化方志的社会教化功能。实践充分证明，唯有不断提升地方志的可读性与传播力，才能让方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真正成为无愧于时代、服务于人民、助力于发展的“时代之书、人民之书、实用之书”。

^① 范成大：《吴郡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15页。

^②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首轮地方志编纂经验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四）可读性是数字化时代方志传播的客观需要

当前，数字化、全媒体深刻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短视频、图文资讯、轻量化读物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流形式，传统大部头、纯文字、刻板化的志书难以适应时代潮流。第三轮修志必须顺应传播变革，以可读性为抓手，创新文本形态、拓展传播载体，让志书适配手机阅读、碎片化阅读、可视化阅读需求。提高可读性，是方志融入数字化时代、打破传播壁垒、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传播”的必然要求，更是方志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前两轮编修志书可读性的现实困境与成因分析

首轮与第二轮修志历经数十年实践，编纂出版上万部志书，构建起完善的方志体系，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可读性维度审视，仍存在诸多共性问题，成为第三轮修志必须破解的痛点。

（一）篇目架构固化，缺乏个性与吸引力

1. 体例呆板，千志一面。多数志书沿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章节体，篇目设置照搬上级范本，忽视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导致“工业志、农业志、商业志”千篇一律，“概述、机构、建设、管理”层层嵌套，缺乏独特性与辨识度。

2. 分类僵化，逻辑生硬。篇目分类

过度依赖行政部门划分，“部门色彩”浓厚，忽视事物内在联系与读者阅读逻辑，内容交叉重复、碎片化严重，读者难以把握整体脉络。

3. 重点失衡，特色弱化。普遍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政务、轻民生”“重共性、轻特色”问题，对地域独有文化、特色产业、民俗风情、民生热点记述不足，难以引发读者共鸣。如冀南多地二轮志书篇目高度雷同，均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机械排列，对本地磁州窑文化、太行民俗、红色革命遗址等特色内容未单独设篇^①，读者辨识度低。

（二）内容选取失衡，缺乏温度与鲜活感

1. 资料堆砌，缺乏提炼。志书沦为“部门资料汇编”，大量罗列数据、文件、会议，未对史料进行筛选、整合、升华，“流水账式”记述居多，缺乏深度与逻辑。

2. 重事轻人，缺乏人文关怀。过度注重政务、经济等宏观事务，忽视人的主体地位，“以事系人”落实不到位，普通群众的生活变迁、奋斗故事、精神风貌缺失，志书缺乏烟火气与温度。如“部分县二轮志书记述农业发展，只写产量、面积、项目，不记载普通农户种植结构变化、家庭收入变迁、生活改善细

^① 孟跃亭：《精品志书编纂困境探究》，《中国方志》2019年第1期第26页。

节”^①，缺少“以事系人”等内容。

3. 避实就虚，缺乏客观性。部分志书“重成绩、轻问题”“重经验、轻教训”，对发展中的失误、困难、短板轻描淡写甚至回避，违背“秉笔直书”原则，降低志书可信度与可读性。

4. 脱离大众，缺乏实用性。内容侧重专业数据、政务流程，忽视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民俗等民生内容，与大众生活脱节，导致“专业人士看不懂、普通群众不愿看”。

（三）语言表达刻板，缺乏文采与通俗性

1. 文风僵化，官话套话泛滥。大量使用“在……领导下”“高度重视”“狠抓落实”等总结报告式语言，句式冗长、表述空洞，违背志书“朴实、简洁、准确”的文风要求。

2. 晦涩生硬，缺乏通俗性。过度使用专业术语，未做通俗化解读，普通读者难以理解；长句居多、修饰繁杂，阅读门槛过高。如有的志书在记述医疗卫生时，大量使用专业术语与行业简称，不做通俗解释^②，普通群众难以理解。

3. 文采匮乏，缺乏感染力。固守“述而不论”误区，将“平实”等同于“平淡”，语言枯燥乏味、毫无生气，既无古志的典雅，也无现代文的生动，难以吸引读者。

（四）呈现形式单一，缺乏视觉与体验感

1. 重文轻图，图文失衡。前两轮志书多以纯文字为主，图片、图表数量少、质量低，且多为政务场景、领导活动，缺乏民生、民俗、自然景观等鲜活内容，图注不全、图文脱节问题突出。

2. 版式陈旧，视觉呆板。封面设计简陋、内文排版拥挤，字体字号单一、无层次划分，缺乏视觉美感，难以给读者良好的阅读体验。

3. 载体单一，传播受限。仅出版纸质文本，未开发数字化、轻量化、多媒体版本，无法适配碎片化、数字化阅读习惯，传播范围狭窄。

（五）传播推广不足，缺乏影响力与知晓度

1. 重编修、轻传播。方志系统普遍存在“编完即大功告成”的思维，忽视志书的宣传推广、解读普及，导致社会大众对志书知晓率低、使用率低。

2. 渠道单一，覆盖面窄。传播仅局限于方志系统、党政机关，进入社区、校园、企业、家庭较少，未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传播渠道，难以触达大众受众。

3. 转化不足，实用性弱。未将厚重的志书转化为通俗读物、短视频、手册等轻量化产品，大众难以接触、理解、使用。

^① 左健伟：《做有温度、有文采、有细节的志书》，《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11期第33页。

^② 谈得平：《浅议三轮修志的继承与创新》，《江苏方志》2025年第12期第41页。

（六）可读性困境的深层成因

1. 编纂理念滞后。固守“官修文献”思维，忽视大众需求，将可读性视为“旁枝末节”，重规范、轻创新，重史料、轻传播。

2. 编纂队伍局限。修志人员多为行政人员、退休干部，缺乏文学、传媒、设计等专业人才，难以兼顾专业性与可读性。

3. 评价体系缺失。志书评审、评优侧重体例规范、资料完备，未将可读性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导致编纂人员缺乏提升可读性的动力。

4. 技术应用不足。数字化、可视化技术在修志中应用滞后，未能借助技术手段创新呈现形式、优化阅读体验。

三、第三轮修志提高志书可读性的总体原则与核心理念

第三轮修志提高可读性，必须坚守方志底线、顺应时代潮流、贴近大众需求，把握“守正创新、以人为本、科学实用、融合传播”四大原则，树立全新编纂理念。

（一）坚守底线：可读性与权威性统一

提高可读性，绝不意味着弱化史料真实性、降低编纂规范性。必须坚守“存真求实、述而不论、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方志核心原则，确保史料准确、体例科学、内容严谨，在权威可信的基

础上提升阅读魅力，杜绝为追求生动而虚构史实、为追求通俗而违背规范。如“某试点单位三轮志书为追求生动，对部分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渲染，导致史实失真，被评审专家要求整改”^①，说明可读性必须以真实准确为前提。

（二）守正创新：传承与突破兼顾

传承前两轮修志在体例规范、史料搜集、审核把关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摒弃呆板固化、脱离大众的弊端；突破传统思维桎梏，在篇目架构、内容选取、语言表达、呈现形式上大胆创新，实现“传统方志精髓”与“现代传播理念”的有机融合。

（三）以人为本：以受众需求为导向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编纂理念，跳出“部门视角、政务视角”，转向“大众视角、民生视角”，聚焦群众关心、关注、关切的内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编纂志书，让志书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

（四）科学实用：可读性与实用性结合

可读性的最终目标是“用得上”，既要让读者“看得懂、愿意看”，更要让读者“查得到、用得上”。优化篇目逻辑、完善检索系统、丰富实用内容，让志书成为兼具史料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工具书、科普书、文化书。

（五）融合传播：文本与全媒体联动

^① 薛长林：《实现第三轮修志高质量目标应遵循十修规则》，《四川方志》2025年第7期第9页。

顺应数字化时代趋势，打破“单一纸质文本”局限，构建“纸质志书+数字志书+轻量化读物+全媒体产品”的传播体系，让志书适配不同载体、不同场景、不同受众的阅读需求。

四、第三轮修志提高志书可读性的实践路径

（一）创新篇目架构：打造科学灵动的阅读骨架

篇目是志书的“骨架”，科学灵动的篇目是提升可读性的基础。第三轮修志需打破传统篇目桎梏，构建“科学分类、突出特色、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篇目体系。

1. 优化分类逻辑，打破部门壁垒。摒弃“按行政部门分类”的僵化模式，遵循“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原则，按事物属性、发展规律、阅读逻辑分类，减少交叉重复。如将分散在多部门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整合为“民生保障”编^①，按群众关心的生活逻辑设置，而非按机构设置。同时，合理设置层级，简化三级、四级篇目，避免过度碎片化，让读者一目了然。

2. 突出地域特色，彰显独特个性。坚持“详特略凡、详异略同”，采用升格法、前置法、详记法凸显地域特色。对独有文化、特色产业、标志性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升格设篇”，单独成章成编；将特色内容置于篇目前端，优先

呈现；对特色事物浓墨重彩记述，细化细节、挖掘内涵，杜绝“千志一面”。如邯郸及周边可专设“磁州窑文化篇”“太行民俗篇”“赵国历史文化篇”“红色革命篇”，升格记述、突出辨识度。

3. 彰显时代特征，记录发展历程。紧扣第三轮修志时代主题，增设新时代特色篇目。新增“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共卫生”“生态文明”等篇章，记录新时代变革；设置“专记”“特记”“纪略”，集中记述脱贫攻坚、抗击疫情、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完整呈现时代脉络。同时，合理调整篇目比重，弱化传统冗余内容，强化新时代、新事物、新风貌记述。

4. 强化民生导向，贴近大众生活。增设民生专题篇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记述教育均衡、医疗提升、住房改善、就业创业、养老服务、民俗传承、生活变迁等内容，增加“民生小事”“市井百态”“乡土风情”等板块，让志书充满烟火气，引发大众共鸣。

5. 活化体裁运用，丰富表达层次。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考八大体裁，打破单一记述模式。强化“概述”“小序”作用，以精炼文字概括全貌、引领阅读；灵活运用“专记”“特记”，深入解读重大事件、特色内容；优化“人物传”，既记英模人物，也记草根

^① 王欣：《第三轮志书应该有怎样的面孔》，《成都方志》2026年第2期第7页。

能人、工匠艺人，体现“以事系人”；增加“杂记”“附录”，收录轶闻趣事、民俗歌谣、文献辑录，丰富志书内容。

（二）优化内容选取：注入有温度有深度的阅读灵魂

内容是志书的“灵魂”，鲜活饱满的内容是提升可读性的核心。第三轮修志需摒弃资料堆砌，坚持“精选、精炼、精述”，让内容有深度、有温度、有活力。

1. 精选史料，去粗取精。改变“全盘收录”的模式，对史料进行筛选、甄别、整合。剔除空洞文件、重复数据、无效信息，保留具有史料价值、时代价值、民生价值的内容；突出“大事、要事、新事、特事”，聚焦事物发展的兴衰起伏、经验教训，避免流水账式记述；加强民间史料、口述史料、民生史料搜集，弥补官方资料短板，让内容更全面、更鲜活。

2. 以事系人，彰显人文温度。落实“以事系人、人随事出”，打破“重事轻人”误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篇章中，融入普通群众的奋斗故事、生活变迁、精神风貌。如“记述乡村振兴，可选取1~2个普通村庄、家庭的变迁故事，以小见大，代替单纯数据汇总”^①，让志书有血有肉、有人情味；优化人物记述，避免简历化、平面化，通过具体

事例展现人物精神。

3. 秉笔直书，客观辩证记述。坚守“秉笔直书”传统，既记成就与经验，也记问题与教训。客观记述发展中的困难、失误、短板，不溢美、不隐恶；辩证分析事物发展规律，不片面、不极端，让志书真实可信、具有资政价值；正视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实回应群众关切，提升志书公信力。

4. 细节赋能，增强鲜活质感。摒弃“宏观空洞”记述，注重历史细节、生活细节、文化细节挖掘。用具体案例、生动细节替代抽象表述。如记述城市建设，可写“街巷拓宽、路灯更新、口袋公园建成、群众早晚健身休闲”等细节^②，增强画面感，让读者身临其境。

5. 民生优先，贴近大众需求。加大民生内容比重，详细记述群众关心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住房保障、交通出行、物价变化、民俗传承、休闲娱乐等内容；增加地域特产、历史遗迹、非遗技艺等实用性信息，让志书成为群众了解家乡、生活实用的“百科全书”。

（三）锤炼语言表达：塑造简洁生动的阅读质感

语言是志书的“肌肤”，简洁生动的语言是提升可读性的关键。第三轮修志需摒弃刻板官话，锤炼“朴实、准确、简洁、生动”的方志语言，实现“雅俗

^① 左健伟：《做有温度、有文采、有细节的志书》，《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11期第35页。

^② 左健伟：《做有温度、有文采、有细节的志书》，《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11期第36页。

共赏”。

1. 坚守文风底线，规范志书语言。严格遵循志书语言规范，使用规范现代语体文，杜绝文言文、口语化、方言滥用；坚持“述而不论”，不发表议论、不抒发感情、不夸大宣传，用事实说话；确保语言准确无误，数据、名称、时间、地点精准无误，杜绝错别字、病句。

2. 摒弃官话套话，简洁通俗表达。删除“在……领导下”“高度重视”“狠抓落实”等冗余表述，变“总结报告式”为“史实记述式”。如将“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下，多措并举狠抓落实”等套话删除，直接记述“某工程于某年启动、某年建成、惠及多少群众”^①，精简句式，变长句为短句，删减不必要的修饰语、关联词，做到“文简事丰、言简意赅”。通俗化解读专业术语、行业词汇，避免晦涩难懂，让普通群众轻松读懂。

3. 适度增添文采，增强感染力。打破“平实等于平淡”误区，在准确简洁的基础上，适度增添文采。概述、小序可采用散文笔法，凝练生动、富有气势；对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历史场景，可适度运用描写手法，生动形象、富有画面感，做到“文而不丽、质而非野”。

4. 统一语言风格，保持整体协调。全志语言风格统一，避免前后不一、杂乱无章；规范称谓、数字、计量单位、

标点符号，符合国家出版标准；总纂严格把关，打磨语言细节，让志书语言流畅自然、朗朗上口。

（四）创新呈现形式：打造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

形式是志书的“外衣”，新颖美观提升可读性的载体。第三轮修志需打破“重文轻图”“形式单一”局限，实现“图文并茂、装帧精美、载体多元”。

1. 强化图表演绎，可视化呈现内容。大幅增加图片、图表数量，提升质量。将历年GDP、居民收入、粮食产量等数据，用折线图、柱状图呈现^②，比大段文字更直观易读，实现“无图不成志、图表相得益彰”。

2. 优化版式设计，提升视觉美感。精心设计封面、扉页、环衬，体现地域特色、文化内涵；内文排版合理，分栏清晰、字体字号层次分明，标题醒目、疏朗有致；合理运用留白、线条、边框，避免拥挤杂乱；装帧精美、用纸考究，提升志书质感，让读者“一见钟情”。

3. 多元载体呈现，适配数字化阅读。构建“三位一体”呈现体系。纸质志书：打造精装、平装版本，满足馆藏、个人收藏、阅读需求；数字志书：开发电子版、网页版、小程序版，实现检索、复制、分享、跨端阅读；轻量化产品：编纂乡土志绘本、文旅手册、民生简编、

① 邱新立：《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解读》，方志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② 王欣：《第三轮志书应该有怎样的面孔》，《成都方志》2026年第2期第9页。

短视频、音频读物等，适配碎片化阅读，扩大传播范围。

4. 引入数字技术，拓展阅读维度。运用二维码、AR、VR技术，拓展志书内容。在纸质志书中嵌入二维码，链接视频、音频、高清图片、延伸阅读，实现“一书多能”；开发AR志书，扫描图片呈现动态场景，增强互动体验；建立方志数据库，实现史料检索、对比、分析，提升实用性。

（五）完善检索系统：提升便捷高效的阅读实用性

志书作为工具书，便捷检索是可读性的重要组成。第三轮修志需构建“多维度、全覆盖、易操作”的检索系统，让读者快速查找所需内容。

1. 优化目录体系。编制详细目录，涵盖篇、章、节、目四级，清晰呈现内容结构；增设“简要目录”“详细目录”，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目录标题简洁醒目、准确概括内容，方便快速定位。

2. 编制主题索引。编制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事件索引、特色索引。如编制“地名索引”“人物索引”“非遗索引”，读者可快速查到某村、某人、某项民俗的记载位置^①，弥补分类检索不足。索引要规范统一、排序清晰，方便读者精准查找，降低检索难度。

3. 增设阅读指南。卷首增设“阅读

指南”，说明篇目结构、检索方法、体裁运用、特色内容，引导读者快速熟悉志书、高效阅读；概述、小序起到“提纲挈领”作用，帮助读者把握整体脉络。

（六）强化传播推广：实现全域覆盖的阅读影响力

“编”是基础，“传”是关键。第三轮修志需打破“重编轻传”思维，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传播体系，让志书走进大众、深入人心。

1. 树立传播理念，全程融入编纂。将传播思维贯穿修志全过程，从篇目设计、内容选取到形式创新，均考虑传播需求；提前规划传播方案，同步推进志书编纂与宣传推广，实现“编完即传播、出版即出圈”。

2. 拓宽传播渠道，覆盖多元受众。“利用地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分期推送志书中的乡土故事、历史趣闻、老照片”^②，扩大社会知晓度。系统内传播：方志系统交流，志书评审、研讨、推广活动；政务传播：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赠送方志成果，作为决策参考、培训教材；社会传播：方志成果进入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图书馆、书店，搭建读志用志平台；新媒体传播：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发布志书精华、短视频、图文解读，扩大社会知晓度。

^① 薛长林：《实现第三轮修志高质量目标应遵循十修规则》，《四川方志》2025年第7期第11页。

^② 谈得平：《浅议三轮修志的继承与创新》，《江苏方志》2025年第12期第43页。

3. 推动转化利用，实现以用促读。将志书内容转化为通俗读物、乡土教材、文创产品、文旅攻略、展览展板等，让厚重的方志文化轻量化、通俗化；开展“方志进万家”“乡土文化课堂”“志书解读会”等活动，普及方志知识，激发阅读兴趣。

4. 加强分众传播，精准对接需求。针对不同受众定制传播内容。面向干部推出“资政摘要”，面向学者推出“史料汇编”，面向青少年推出“乡土绘本”，面向群众推出“民生手册”，实现精准传播、有效阅读。

第三轮修志正逢新时代、新征程，提高志书可读性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事业的需要。这不是对方志传统的背离，而是对方志精髓的传承；不是对史料价值的弱化，而是对方志功能的

升华。

第三轮修志需坚守“存真求实”的初心，以创新篇目为骨架、鲜活内容为灵魂、生动语言为肌肤、多元形式为外衣、便捷检索为支撑、广泛传播为路径，兼顾权威性与可读性、专业性与通俗性、史料性与实用性，让志书从“馆藏书”变为“大众书”，从“尘封文献”变为“鲜活经典”。

唯有如此，才能让地方志真正记录新时代、传承地域文明、服务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书写新时代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熊蜀黔

试论地方综合年鉴生态部类框架的设置

王志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地方综合年鉴生态环境类目的篇目设置提供了根本遵循。但由于生态文明等概念外延过大，政府职能部门设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地方综合年鉴在设置生态部类框架时，缺少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所记述的内容存在相当差异，给读者检索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地方综合年鉴必须梳理相关概念和政府职能部门职责，结合框架设计原则和组稿工作的可行性及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全面性，综合考量生态部类的框架设计。

一、生态部类框架的设置

地方综合年鉴生态部类框架的科学构建，需以政府职能分工为依托，厘清生态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着力构建兼具理论严谨性与实践可操作性的框架体系。

（一）厘清生态部类的记述范畴

生态部类的框架设计首先依赖于对“生态”“生态文明”“生态环境”三大核心概念的精准把握，三者内涵层层递进又各有侧重，共同界定了年鉴生态记述的核心范畴。

“生态”是指生物在特定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发展状态及自身生理特性与生活习性，其概念外延极为宽泛，涵盖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全部互动关系，显然超出年鉴的承载能力，因此，地方综合年鉴的生态部类并非对“生态”概念的全景式记述。“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新型文明形态，致力于构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与消费模式，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改善，其核心在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若仅以单一生态部类承载，必然导致与其他部类的交叉重复。“生态环境”则是指生物及影响其生存发展的所有外界条件的总和，包含光、温度、水等非生物因素与动植物、微生物等生

物因素^①，但其涉及的诸多专业数据与深层信息超出编纂单位的获取能力，无法通过年鉴全面呈现。

综上所述，地方综合年鉴生态部类的记述范畴并非对上述任一概念的完整覆盖，而是聚焦于政府职能部门可提供、年鉴可承载的生态相关工作实践，重点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与年度进展，形成“有限范畴、重点突出”的记述逻辑。

（二）明确生态部类的内容来源

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划分直接决定年鉴生态部类的内容来源与版块结构，尤其是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门成为生态记述的核心供稿主体，同时其他部门的生态职责也需纳入统筹考量，形成“核心主导、多方协同”的供稿格局。

从国务院组成部门职责来看，自然资源部的21项职责中有4项明确提及“生态”，核心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耕地生态保护等关键领域，具体包括组织编制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等工作，是生态空间管控与资源保护的主要责任主体。生态环境部的16项职责中13项明确包含“生态”内容，剩余3项（核与辐射安全监

管、应对气候变化、专项任务）虽未直接提及，但本质上与生态保护密不可分，其职责覆盖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监管等全链条^②，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执行部门。

除两大核心部门外，多领域职能部门也承担着重要生态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承担村镇人居环境改善职责；水利部统筹生态环境用水保障与河湖生态修复^③。随着“管发展必须管生态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生态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生态环保”理念的深化，“大生态环保”格局逐步形成，任何单一部门都无法独立支撑生态部类的内容需求，这就要求年鉴框架设置必须兼顾多部门生态职责，实现内容来源的全面覆盖。

二、地方综合年鉴生态部类设置存在的问题

为精准把握生态部类框架设置的现实状况，笔者研读了包括《江苏年鉴（2020）》《北京年鉴（2020）》《天津年鉴（2020）》《上海年鉴（2020）》《浙江年鉴（2018）》《安徽年鉴（2020）》《福建年鉴（2020）》等20余部省级综合年鉴及《江苏年鉴（2022）》《盐城年鉴（2021）》《成都年鉴（2023）》等15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69-1170页。

② 中国机构编制网：《生态环境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2018年9月11日。

③ 中国机构编制网：《生态环境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2018年9月11日。

中国精品年鉴、全国特等年鉴，拟从类目命名、位置排布、内容记述三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梳理，以供同仁参考。

（一）类目命名混乱

类目名称是部类内容的集中体现。从已出版的综合年鉴看，生态类目标题设置呈现多元化特征，但部分命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内涵外延失当等问题，主要分为五种类型，其中三类存在明显逻辑缺陷。

第一类是设置“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类目。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原环境保护部及多部门相关职责，其工作范畴已远超传统“环境保护”的污染治理局限，涵盖气候变化应对、水功能区划、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全新领域。继续使用“环境保护”或“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类目标题，既无法体现机构改革的核心意义，也难以涵盖生态环境部门的完整职责，导致标题与内容的错位。第二类是设置“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类目。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概念关联性较弱，此类目多为“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两个分目的简单叠加，仅为平衡篇幅而设，缺乏内在逻辑关联，从框架设置科学性来看并无实质意义，反而反映出生态部类“记述偏少、比例失调”的被动现状。第三类是设置“生态”“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建设”类目。由于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融入性”特征，其内容贯穿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仅靠单一类目无法承载，此类目下实际记述的仍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具体工作，标题宏大而内容单薄，形成“名实不符”的矛盾。

此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类目的设置相对科学，但仍存在地域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部分地区未结合本地生态特色增设细分版块，导致框架的针对性不强。从精品年鉴样本来看，类目分目数量差异显著，如，《河南年鉴（2023）》设17个分目，而《德化年鉴（2021）》仅设3个，条目数量最多与最少者相差近9倍^①，反映出框架设置的规范性与均衡性亟待提升。

（二）位置排布无序

生态部类在年鉴中的位置直接体现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定位，从省级年鉴的生态类目设置来看，大体可分为六种情况，其中部分排布方式违背编纂逻辑，有些内容归属失当，未能准确反映生态建设的战略地位。

从合理性来看，四类位置设置具备逻辑支撑：一是置于政治部类之后、经济部类之前，可凸显生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与引领作用；二是置于社会部类之后，契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排序逻辑；三是夹在经济部类末尾与文化部类

^① 刘传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年鉴研究》2018年第4期。

之间，延续传统城乡规划、环境保护的归类习惯，具备历史延续性；四是置于社会部类之后且后续仅设行政区域概况、人物等类目，符合“综合性内容后置”的编纂惯例。

两类位置设置存在明显问题：一是将生态部类归入经济部类，违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独立战略布局的定位，混淆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二是夹在文化部类与社会部类之间，生态建设与文化、社会领域缺乏直接关联，此类排布既无理论依据，也不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从精品年鉴情况来看，部分年鉴还存在分目设置偏离生态核心的问题，如某年鉴生态相关分目聚焦“市容环境、园林绿化”，有的年鉴“园林绿化分目”以基层监管机构为记述主体，均偏离了生态系统构成与保护的核心内容。

（三）内容记述失衡

除框架结构问题外，生态部类的内容记述还存在覆盖范围不全面、比例分配不协调、价值导向单一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年鉴“存史、资政、育人”的核心功能。

在覆盖范围上，存在“三重三轻”现象：一是重核心部门轻协同部门，内容多集中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部门，对发展改革、住建、水利等部门的生态职责记述不足；二是重常规工作轻特色实践，对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等常规工作记述翔实，但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生态扶贫等特色工作挖掘不够；三是重成果数据轻问题分析，多数年鉴仅记载环境质量改善、生态工程推进等成就，对土壤污染、水体退化等突出问题及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况避而不谈，违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存真求实，客观反映成绩与问题”的要求。

在比例分配上，生态内容占比严重偏低。20余部省市级年鉴中，仅7部专设生态文明相关类目，所占比例不足30%；部分年鉴生态内容仅设1个条目数百字，与经济、政治等部类形成巨大反差。在记述深度上，专业化程度不足，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监测技术等内容记述流于表面。《成都年鉴（2023）》“生物多样性保护”分目下设野生动物调查与监测、野生动物收容与保护等14个条目，此类兼具专业性与丰富性的案例较为少见。

（四）问题根源剖析

生态部类框架设置问题的产生，是认知偏差、机制缺陷与实践短板共同作用的结果，需从编纂主体、供稿体系、制度保障三个层面追溯根源。

认知层面，编纂者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存在局限。部分编纂者未能厘清“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的概念边界，将生态部类等同于传统环保内容；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认识不足，未充分把握生态建设的战略地位；精品意识薄弱，满足于“有内容即可”，缺乏对框架科学性、内容系统性的深入考量。

机制层面，供稿体系与审核机制不完善。当前缺乏集中统筹生态文明建设的供稿主体，环保、林业等部门仅能提供部分内容，导致资料分散；年鉴编纂者主动争取稿源的力度不足，对生态融入其他领域的内容挖掘不够；经费使用、内容审核等流程缺乏生态导向的刚性约束，难以保障生态内容的质量与体量。

实践层面，地方特色与时代要求结合不足。部分编纂者缺乏地情研究能力，未能将本地生态禀赋（如沿海湿地、草原沙漠、江河湖泊）转化为框架特色；对“双碳”目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新实践跟踪不及时，框架设置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进程。

三、地方综合年鉴生态部类的框架重构

基于上述分析，地方综合年鉴生态部类框架设置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遵循“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特色鲜明、逻辑严密”的原则，从类目命名、结构设计、内容筛选、位置排布四个维度进行系统优化，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相匹配的框架体系。

（一）规范类目命名

类目标题的确定需兼顾“职能匹配性”与“概念准确性”，核心类目建议命名为“生态环境”，既契合生态环境部门的核心职责，又可涵盖相关部门的协同工作，避免概念过大或过小的问题。同时，根据地域特色增设特色类目或分目，形成“核心类目+特色版块”的命名模式。

“生态环境”作为核心类目，其内涵应包括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环境监管等核心内容，避免与“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管理”等类目简单叠加。对于生态特色鲜明的地区，可采用“类目升格”或“分目细化”的方式凸显特色，如盐城因“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设“世遗湿地”类目，黄冈设“大别山南麓水资源综合治理”分目，长春在“黑土地保护”分目下细化保护性耕作、示范基地建设等条目。

在分目标题设置上，需遵循“逻辑递进、内容专属”的原则，避免交叉重复。建议核心分目包括“综述”“生态环境质量”“山水林田湖草沙资源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生态环境监管”，各分目下再按具体工作细化条目，形成“类目-分目-条目”的清晰层级。

（二）构建科学结构

生态部类的结构设计应构建“综述统领-核心支撑-监管闭环”的完整体系，既覆盖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领域，又突出年度重点与地域特色，实现“全面性”与“针对性”的统一。具体框架建议如下：

1. 综述分目聚焦宏观统筹与战略引领

作为生态部类的统领部分，综述需聚焦“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记述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内容，包括生态建设规划、生态环境立法、环保投入、管理体制改革、绿色低碳发展、

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跨区域生态治理联动机制等。可借鉴《江苏年鉴(2022)》的做法,设置“生态环保投入”“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绿色金融”等条目,全面反映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与整体成效。

2. 核心资源保护分目凸显“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

此部分为生态部类的主体内容,按“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要求设置分目,精准反映各类生态资源的保护状况,每个分目下结合部门职责与年度工作细化条目:

生态环境质量 作为基础性分目,记述空气、水、土壤、声、辐射等环境质量的监测数据与变化趋势,客观反映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与薄弱环节,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水资源保护 涵盖水土保持、河湖长制、饮用水源地保护、水生态修复、黑臭水体治理、节水型城市建设等内容,突出江河湖泊等水体的保护与修复实践。

土地资源保护 包括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盐碱化与沙漠化防治、土壤污染修复、土地执法等,聚焦土地资源的数量与生态质量双重保护。

地质矿产资源保护 记述地质保护规划、绿色勘查、矿山地质环境修复、地质遗址保护等,重点反映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措施。

森林资源保护 设置林长制、造林绿化、退耕还林、公益林补偿、林业病

虫害防治等条目,体现森林生态系统的修复与可持续利用。

海洋和渔业资源保护 针对沿海地区设置,包括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海洋牧场管理、海域综合治理、长江流域退捕禁捕等内容。

湿地和自然保护区保护 涵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保护情况,按保护地级别与类型细化条目,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3. 环境治理分目形成“防治-减排-监管”闭环

此部分聚焦生态环境的主动治理,体现“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力”的要求,包括三大核心分目:

污染防治 按污染类型细化为大气、水、土壤、噪声、核与辐射污染防治,同时涵盖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业污染防治等,全面反映污染治理的具体举措与成效。

节能减排 围绕“双碳”目标,记述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节能实践,包括新能源汽车推广、循环经济发展、碳排放管理、节能技术应用等内容,体现绿色发展理念。

生态环境监管 涵盖环境监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环保信用评价、环境执法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等,突出监管的刚性约束与成效,同时客观记述生态环境风险与突出问题,强化年鉴的鉴戒功能。

(三) 明确位置排布

生态部类的位置应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年鉴编纂惯例，建议采用两种优化方案，各地可根据生态重要性与编纂传统灵活选择。方案一：突出生态战略地位，将“生态环境”类目置于政治部类之后、经济部类之前。此排布方式可凸显生态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与约束作用，契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适用于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生态地位突出的地区。方案二：遵循“五位一体”排序逻辑，将“生态环境”类目置于社会部类之后。此排布方式符合国家战略布局的表述顺序，逻辑清晰，适用于多数地区，且与年鉴“综合性内容后置”的惯例相契合。若采用此方案，需注意将“生态环境”类目置于“自然资源管理”“城乡规划与建设”等类目之前，体现“保护优先于开发”的原则。

建议将综合情况类目中的生态内容作为“行政区域概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生态建设概况”分目，对年度生态工作进行总括性记述，与“生态环境”类目形成“总-分”呼应。综合情况类目的位置以置于文字资料之首为宜，便于读者快速把握区域生态基本状况。

（四）强化实施保障

框架的优化需配套完善的实施机制，从认知提升、供稿保障、质量管控三个方面确保生态部类内容的质量与体量。

一是深化认知培训，组织编纂人员

系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厘清生态相关概念边界，强化“精品意识”与“问题意识”，树立“全面记述、客观反映”的编纂理念。二是构建协同供稿体系，由年鉴编纂单位牵头，建立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发展改革等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明确各部门的供稿责任与内容清单，主动挖掘生态融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叉内容，破解稿源分散问题。三是完善质量管控机制，将生态部类内容质量纳入年鉴评审指标体系，重点考核框架科学性、内容完整性、数据准确性与问题针对性，对生态特色突出、内容翔实的年鉴给予激励，引导各地重视生态部类的编纂工作。

地方综合年鉴中的生态部类的篇幅占比虽不及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部类，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记述框架下，其战略重要性毫不逊色。这就要求年鉴工作者紧跟新时代的脚步，及时学习吸收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成果，注意跟踪生态文明建设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实践，忠实记录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历程，全面地镌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辉煌成就。

（作者单位：江苏省响水县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伟

方志馆建设要着力突出方志特色

——以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为例

杨立宇

方志馆是传承地方历史文脉、展示地域文化、服务社会大众的公共文化阵地。方志性是其本质属性，也是区别于博物馆、文化馆等场馆的核心标识。方志性的核心在于遵循“横分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作、越境不书”的体例，以志书为根基、以地情为核心、以史实为依据，防止和杜绝泛文化化、博物馆化、娱乐化倾向，真正做到“馆以志立、业以志兴、效以志显”。

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以下简称黄河分馆）紧扣“志说黄河、志说东营”核心定位，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扎根黄河入海口独特地域文脉，始终把突出方志性贯穿馆藏建设、展陈打造、运行服务、成果转化全过程，摒弃“重场馆、轻内涵，重形式、轻内容，重文旅、轻主业”的误区，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特色鲜明、实效突出的方志馆建设发展之路。截至2026年3月，累计接待观众200余万人

次，年均接待研学团队500余批次、党政考察团300余批次，先后获评全国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东省优秀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为新时代方志馆坚守本色、突出特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

一、筑牢志藏根基，以全域化方志资源体系，夯实方志性立身之本

馆藏方志资源是方志馆的“压舱石”，是彰显方志性的首要前提。没有系统、完整、权威的志书、年鉴、地情文献资源，方志馆就失去了核心内核，方志性便无从谈起。黄河分馆始终把馆藏建设作为基础性、根本性工作，构建起覆盖黄河流域、贴合东营地情、古今兼备、藏用结合的方志资源体系，让方志性有支撑、有底蕴。

（一）全域精准征集，充实志鉴资源库。面向黄河全流域，制定馆藏征集方案，聚焦方志核心资源，深入开展全域化、精准化征集，彻底破解“有馆无

藏、藏而不全、品类单一”的问题。近年来，主动征集沿黄九省区省、市、县三级综合志书、专业志、部门志、行业志、综合年鉴、水利志及黄河文化史料、历史舆图等，累计征集《黄河志》《山东通志》《河南通志》《陕西通志》《山西通志》等沿黄志书3200余种、10000余册，沿黄三级志书收藏率近100%，完整覆盖黄河流域自然地理、历史变迁、治理开发、人文民俗等领域。深耕本土方志资源，征集历代旧志、乡镇村志、地情资料及口述史、族谱家谱、地方文史资料等，珍藏《乐安县志》《利津县志》等旧志120余部，其中孤本善本11部，填补了东营地方旧志馆藏空白；系统征集胜利油田开发、黄河口移民、湿地生态、盐业文化等特色专题资料2000余件，形成“流域志+地方志+专题资料”互为补充的馆藏格局。截至2026年3月，累计馆藏方志文献、地情资料5200余种、近10万册，历史图片15.8万幅、音像资料2.7万秒。推进方志资源数据化进程，数字方志数据库累计存储文献资料5000余册、数据量达12TB，支持关键词检索、全文阅览、在线下载，加快建设沿黄地区方志资源共享平台。

（二）重视实物馆藏，丰富方志资源门类。实物尤其是老物件是方志馆的重要馆藏资源和展览载体，收藏、展示老物件，可以让观众直观感知过去的生活方式、社会面貌和文化变迁。老物件具有传承历史记忆、彰显地域文化、延续

民俗传统、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功能。在乡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收藏和展示老物件是方志馆的重要使命。黄河分馆建馆之前，历时两年征集老物件六大类700余件。其中：有见证新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代选民证；有见证一战华工的纪念章；有见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清河区、渤海区战斗历程的珍贵书籍；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历史的地契、账本；有见证胜利油田开发建设历程的珍贵物品；有见证时代发展的宣传画、木版画、电影海报；有见证黄河口先民生产生活老票据、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生活百态的民俗用品；有见证东营地区先模人物事迹的个人物品，等等。对于社会上有意捐赠老物件者，通过一定程序接纳，给捐赠者出具收藏证书，登记编号保存。2020年，黄河分馆一次性接受社会捐赠文物6件，其中，奥运火炬1件，老族谱3册，文物2件，丰富了馆藏和展品。目前，黄河分馆馆藏老物件达1200余件。

（三）深化藏用结合，激活馆藏资源价值。打破“重藏轻用”的传统模式，坚持“以藏促用、以用兴藏”，推动馆藏方志资源从“静态收藏”向“动态利用”转变，让沉睡的志书文献活起来。依托馆藏资源，编纂出版《画说东营》《黄河入海涌大潮——东营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五周年实录》《你的样子——东营重要历史人

物画传》《岁月如歌——黄河口老民谣》《时光有痕——黄河口老物件》《寻踪觅迹——黄河口老地方》等地情图书26部，其中《你的样子——东营重要历史人物画传》精选自《东营市志》《利津县志》等志书记载的历史人物，图文结合、通俗解读，被列为东营市中小学地情教育读本；《黄河入海涌大潮——东营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五周年实录》全面梳理东营落实国家战略的实践历程，成为党政干部学习地情、谋划工作的重要参考。

二、恪守志体规范，以体例化精品展陈体系，彰显方志性核心之魂

展陈是方志性的直观体现，是方志馆面向社会的核心窗口。方志馆展陈不能照搬博物馆模式，必须遵循地方志编纂体例，以志为据、以体为纲，做到内容源于志、脉络合于志、风格归于志，

让观众通过展陈读懂方志、了解地情、感受文脉。黄河分馆始终坚守方志体例，主题展览以“大河奔流”为总主题，打造“常设展为主体、专题展为补充、特色展为延伸”的展陈体系，让方志严谨性与展陈观赏性有机统一，真正做到“展展有方志、事事有依据”。

（一）对标方志体例，打造规范化常设展。严格按照方志“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编纂逻辑设计常设展览，展陈内容以志书、年鉴、权威档案为依据，杜绝虚构、臆造。“中华母亲河”板块对应方志地理志、历史志、水利志、文化志四大门类，设置壮美黄河、沧桑迭变、治河大业、文明之光4个部分，全面展示黄河5464公里流域的自然风貌、历史变迁、治黄历程、人文底蕴。其中“治河大业”展厅以《黄河志》《黄河水利志》为核心依据，通过动态电子沙盘精准还



黄河流域红色文化主题展

原黄河六次大改道，搭配历代治河方略、水利工程、治河人物史料，每一组数据、每一段史实均标注志书出处，清晰呈现从古代治河到现代黄河治理的历史脉络，尽显方志“实事求是、述而不作”的特质。“魅力黄河口”板块对标《东营市志》，聚焦“黄河入海口、胜利油田、移民之乡、湿地之城、盐业古地”五大特色，依托市县两级志书，系统展现东营从古代盐业开发、近代移民迁徙、现代油田开发到新时代生态保护的完整发展历程。

（二）立足方志特色，打造权威性专题展。紧扣时代主题与方志主业，结合黄河文化、地情教育、国家战略等重点内容，策划推出一批兼具方志性、时代性、权威性的专题展览，丰富展陈体系，彰显方志价值，所有专题展素材全部取自馆藏志书、地情资料。2024年推出“大河奔流·红色血脉——黄河流域红色文化专题展”，是重点打造的红色文化与方志文化融合展。展览以黄河流域各省红色志书、地方史志为依据，分区域梳理黄河流域红色文脉，开展以来累计接待观众28万人次，成为全省红色教育与方志教育融合示范展。2025年10月举办“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治黄文化专题展”，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整合沿黄九省区治黄志书、水利档案、治黄实物，系统梳理黄河治理历史经验，展出《黄河水利志》《山东黄河志》等文献120余册，治黄工具、档案资料80余

件，开展1个月接待观众3.2万人次。常设“牢记嘱托·勇担使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东营实践专题展”，以《东营市志》、历年年鉴、专项档案为核心，通过志书数据对比、政策原文展示、实践成果呈现，全面展现东营落实国家战略的成效，年均接待党政机关学习团队300余批次，成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景课堂。推出的《黄河古地图展》《黄河口民俗文化展》等临时展览，均以馆藏志书、地情资料为支撑，做到“一展览一主题、一主题依一志”。

（三）创新展陈形式，专业性通俗性结合。在坚守方志体例、内容权威的前提下，创新展陈方式，破解传统展陈枯燥、晦涩、难懂等问题，兼顾专业人士与普通观众需求，让方志文化可感可触、深入人心。融入场景复原、AR互动、VR体验等现代化手段，复原黄河口盐场、胜利油田早期钻井平台、垦区开发建设、明初大移民等场景，搭配老物件、原声录音，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打造《遇鉴东营》展厅，系统陈列《黄河志》《东营市志》《年鉴》等图书，供观众现场翻阅、查阅，实现“观展+读志”同步进行。运用AR互动技术，观众可扫描展陈地图、志书页面，即可联动呈现黄河变迁、湿地演化、行政区划调整等动态画面，将专业方志数据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体验。同时，配备专业讲解员，解读展陈内容的志书依据、史料来源，让观众不仅看展览，更懂方志内涵，真正实现

“专业人士看方志脉络、普通群众看地域故事”。

三、深化志用转化，以实效化价值赋能体系，释放方志性功能之效

方志性要落到“存史、资政、育人”的核心功能上，既要“藏志、展志”，又要“研志、用志”，把方志的资料优势、史实优势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黄河分馆坚持“以用为本、志用相融”，构建“编研赋能、资政辅治、育人润心”的价值转化体系，让方志性从资源、展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效能。

（一）深耕方志编研，夯实存史基础。以馆藏志书、展陈内容为依托，持续深化方志编研工作，推出高质量编研成果，履行好“存史”核心职责。坚持《东营市志（1996—2013）》编修与黄河分馆建设同步推进，相辅相成，以志促馆，以馆促志。持续编纂《东营大事记》《东营微记事》等期刊，推进《东营简志》编纂，积累资料，为市志续修做准备。针对重点专题展览，同步编写配套解读资料、研学手册，将专业方志内容转化为通俗化读物，让编研成果既具权威性，又有普及性。建立展陈、编研双向联动机制，编研成果为展陈提供权威内容，展陈反馈的观众需求为编研指明方向，形成“编研促展陈、展陈带编研”的编、研、展一体化良性闭环发展机制。

（二）强化资政辅治，服务发展大局。发挥地方志“资政”功能，深挖志

书中的地域发展规律、历史经验，围绕地方中心工作，提供精准资政服务，让方志资源成为党委科学决策的“智慧库”。黄河分馆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湿地修复、产业转型、文化传承等重点工作，从《黄河志》《东营市志》及各县区志中梳理历史生态数据、产业发展脉络、文化传承经验，为市委推进域内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历史依据和实践参考，实现“以志资政、以史鉴今”。依托专题展览，为沿黄城市交流合作提供地情参考、经验借鉴，助力黄河流域协同发展，彰显方志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担当。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出《中国力量》《初心·使命》《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大河奔流·红色血脉》等专题展览及《黄河入海涌大潮》《画说东营》等图书，也发挥了重要资政功能。

（三）做实育人润心，厚植文化情怀。紧扣“育人”使命，以馆为载体，以展为阵地，打造全方位、常态化的地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平台，推动方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厚植家国情怀与地域认同感。打造省级方志文化研学基地，结合展陈与志书内容，开发“志说黄河”“黄河口历史探秘”“治黄文化研学”标准化研学课程，以志书为依据，设计“读志书、观展陈、学地情、写心得”的完整流程，突出方志特色，避免泛文旅化。2024年黄河分馆争创成为山东省级研学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中小學生研学团队900余批次、

近1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方志文化“七进”（进校园、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军营、网络）活动，举办志书阅读分享会、地情文化讲座、专题报告讲座等公益活动，年均覆盖群众超4万人次。在春节、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新春读志”“方志文化宣传月”等主题活动，让群众了解家乡历史、感受方志文化魅力。

四、创新志媒传播，以立体化品牌传播体系，扩大方志性影响之力

方志性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打破方志文化“小众化、专业化、晦涩化”壁垒，让方志文化走出场馆、走向大众，方志性才能被更多人认知、认可、认同。黄河分馆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对内对外同步”，积极创新传播方式、搭建传播平台、打造传播品牌，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接地气的方志文化传播矩阵，加快方志文化破圈出圈。

（一）做强线下传播，打造实体传播阵地。以场馆为核心，打造线下方志文化传播主阵地，提升场馆影响力与吸引力。年均举办主题、专题展览10个以上，组织大型专题文化活动5场左右，2025年暑假期间，单日接待量最高突破4000人次。举办《大河窑语——钧瓷文化与黄河文化联展》《黄河口鸟类生态摄影展》《黄河口湿地生态书画展》等特色展览，将方志文化与艺术、生态、非遗融合，吸引不同群体观众，拓宽方志文化传播覆盖面。争取国家方志馆支持，精心打

造“读黄河就是读中国——黄河流域方志文化书苑”，汇集黄河流域省、市、县三级志书及其他黄河相关图书共计3000余种，为社会各界开展黄河流域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遇‘鉴’东营——东营党史史志编研成果展”集中展示1984至2025年间东营市党史史志系统在党史编研、方志编修、年鉴编纂、存史资政等领域的丰硕成果，为公众开启一扇触摸东营历史、感悟时代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的窗口。展览系统推出《追寻——东营红色印记》《一座城市的红色底蕴——东营红色故事》《“画”说东营》等代表性高质量编纂成果，其中，党史类著作记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营人民的奋斗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精神共识；志书全面系统载录东营的自然变迁、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风貌，清晰勾勒城市发展的完整脉络；地情类作品深度挖掘地域文化特色，生动诠释东营从古文明发祥地到现代新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2025年春节举办“祥蛇纳福·回家过年”东营市第九届新春艺术展，2026年春节举办“骏马奔腾·回家过年”第十届迎新春艺术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广大市民送上新年文化大餐。加强与沿黄城市方志馆交流合作，联合办展、资源共享，先后赴多个沿黄城市举办《黄河流域红色文化展》巡展，让黄河分馆的方志成果走向沿黄、走向全国。

（二）做优线上传播，拓展云端传播

空间。抢抓数字化传播机遇，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传播格局，让方志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全域传播。运营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组建专业运营团队，开设“东营有‘画’说”特色栏目，定期推出东营地方史短视频，提升数字方志馆和馆藏志书数字化进程，将专业志书内容、展陈亮点、地情知识转化为通俗化内容，累计发布620余期，总阅读量突破160万人次。完善数字方志平台、全景展馆功能，优化操作界面、提升访问速度，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查阅志书、观看展览，成为群众了解方志文化的重要窗口。

（三）做精品牌传播，擦亮方志特色名片。注重品牌塑造与口碑传播，打造“志说黄河、志说东营”特色品牌，提升方志馆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依托志书元素、黄河文化、东营地情，推动方志文化与地方文创、非遗融合，开发“志说黄河口”系列文创产品32款100余个品种，将方志文化融入书签、笔记本、剪纸、摆件等产品，让方志文化可携带、可体验、可传播。积极参加全国方志系统交流研讨活动，分享经验做法，接待全国方志系统、文化领域考察团队330余批次，成为全国方志馆建设的标杆。全

方位品牌化传播改变了方志文化“曲高和寡”的固有印象，“方志馆姓方、方志性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更多人了解方志、关注方志、热爱方志。

方志馆是方志事业的重要阵地和平台，肩负着传承历史文脉、服务发展大局、滋养精神家园的重要使命。方志馆建设必须牢牢守住方志性这一根本，不能偏离方志主业、丢掉方志本色、脱离方志特质。只有始终以志书为根基、以体例为遵循、以利用为核心、以传播为抓手，才能建好馆、办好展，真正发挥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核心功能。要坚守“藏志”根基，构建系统完备的方志资源体系，让方志馆有“底气”；要恪守“展志”规范，打造体例严谨的精品展陈，让方志馆有“本色”；要聚焦“用志”实效，深化资政育人价值转化，让方志馆有“作为”；要拓宽“传志”路径，创新立体化传播模式，让方志馆有“影响”。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方志馆突出方志性的完整实践路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责任编辑：熊蜀黔

丹心照虎城 实绩惠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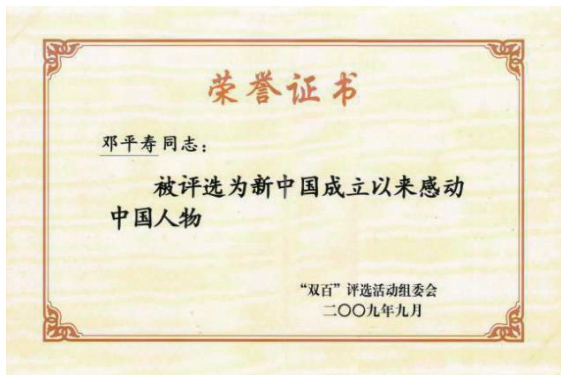
——从史志档案读邓平寿的政绩故事

田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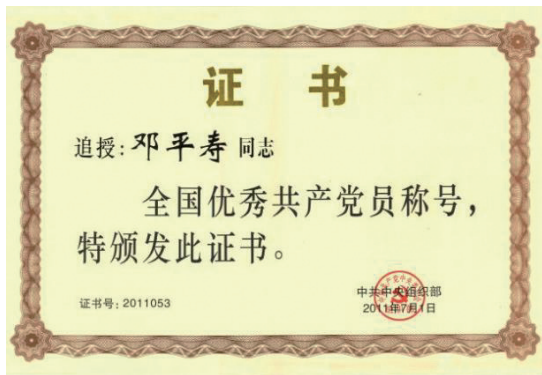
在《梁平县志（1986~2005）》的人物篇章中，记载着这样一位基层干部：他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勤勤恳恳，常深入村组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他，就是邓平寿。据记载，邓平寿生于1955年12月，重庆梁平虎城镇人，197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1月参加工作后一直在虎城工作。2007年1月14日，时任虎城镇党委书记的邓平寿在下村工作途中，因积劳成疾突发重症胰

腺炎倒在工作第一线，2月1日不幸去世，年仅51岁。

31年来，邓平寿始终以百姓之心为心，重实干、敢担当、利长远，把为民初心写在田间地头。他去世后，被追授“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还曾获评“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称邓平寿同志为“新形势下基层干部的杰出典型，新时期共



2009年9月，邓平寿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誉证书。



2011年7月，邓平寿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

产党员的优秀楷模”^①。循着他在虎城大地上留下的坚实足迹，我们更能读懂一位基层干部的赤诚担当与为民情怀。

一、坚守初心，造福百姓

虎城曾因交通闭塞而发展滞后。“梁平大西北，好路也没得，下雨无客车，急死过往客”——这段顺口溜道尽了百姓的无奈。1997年前，村社公路稀少且坑洼不平，农产品和物资进出全靠肩挑背磨，百姓苦不堪言。见状的邓平寿立下铮铮誓言，哪怕勒紧腰带，也要“千方百计把致富路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为集资硬化道路，邓平寿以身作则，带头为村级公路修建捐款8000元。五年间，在他的带动下，虎城镇干部职工捐款累计超过80万元，人均捐资达2000元。此举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效应，农民群众纷纷主动筹资，支持村组公路建设。1998年，虎城镇连接县城的公路率先启动硬化；2002年，上丰村第一条村级水泥路建成通车，全镇掀起大办交通，硬化村、组级公路的热潮。

修路过程中矛盾阻碍层出不穷，邓平寿知难，却从不退。2003年初，陈家村硬化公路时，村民刘久星认为会破坏风水，带家人阻拦施工。邓平寿刚做完肺

切除手术回家不足7天，得知消息后，打着吊针步行前往劝说。邓平寿脸色苍白、说话吃力，每说几句便要停歇，身旁干部还不时提醒他注意手上的输液留置针。刘久星看在眼里，既感动又惭愧，当即同意施工。

在碑垭村四组，修路工作也曾陷入僵局。当时包括组长在内的全体村民都不支持，邓平寿带着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吃了不少闭门羹。他心急如焚，天天拿着图纸研究，才发现设计图中没有支路与碑垭村四组连接，村民看不到实际益处，自然不愿配合。为此，他亲自手绘线路示意图，重新踏勘确定路线，用真心实意打动了村民，让修路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不管你金生银生，把老百姓的路修



带病下村指导工作的邓平寿

^① 习近平：在邓平寿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讲话，2007年7月15日。转引自缪毅容：《学习邓平寿同志先进事迹崇高境界奋发有为开创上海各项工作新局面》，《解放日报》2007年7月16日，第1版。

好才是你的人生！”波漩村因公路建设进度缓慢，邓平寿这样批评村支书王金生。后来这句话，成为了全镇干部群众推进交通事业的精神动力。

一心造福人民的邓平寿，短短几年时间，带领虎城全镇共硬化村组公路48条，总里程达108公里，成为梁平及重庆首个100%实现村村通水泥公路的乡镇，直接受益群众近4万人。

二、长远为计，重教育人

沙石村小学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过数十年风雨侵蚀，校舍陈旧破败，一到雨天便屋顶漏雨，教室里“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一个下雨天，邓平寿检查工作时见此情景，眉头紧锁，暗下决心要改善虎城的办学条件。

为改变虎城各学校的面貌，邓平寿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虎城教育工作，借助学校布局调整契机，秉持“建一校、富一村、兴一方”原则，敲定“一心两翼、四点八面”布局，全力推进村小改建工作。他还重视解决农村教师的后顾之忧，专门出台了针对农村教师家属脱贫致富的系列政策。在邓平寿的努力推动下，虎城形成了“五校一园”格局，教育教学条件明显改善。

虎城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不修‘衙门’修学校”的故事。当时虎城镇政府办公楼十分陈旧，堪称全县最差办公楼之一，原已选定新址准备迁建。但当邓平寿得知学校急需扩建，而政府新址位置最为适宜时，他毅然提议将地块让给

学校，还耐心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我们艰苦一下就过来了，教育的问题不能有丝毫耽误啊”，最终获得大家一致支持。

除了关心办学条件，邓平寿更牵挂着虎城每一个孩子的求学之路。虎城镇河口村的王虎南，因家境贫寒濒临失学，邓平寿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格外沉重。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乡村发展的根基性作用，恳切感叹：“路修得再多，蚕养得再好，孩子没有文化，虎城还会是个穷窝子。”他捐助王虎南重返了校园，心中却忧虑未减：“今年解决了明年又怎么办呢？年复一年又怎么办呢？”怀着对全镇孩童的牵挂，邓平寿反复思索，萌生了创办镇级希望工程的想法。

在邓平寿的牵头推动与全力协调下，1999年2月，虎城镇在重庆市率先实施镇级希望工程，将每年3月18日定为全镇“爱心日”，倡议干部群众及社会各界捐款助学，推动扶危济困、重教兴学的风尚在虎城落地生根。

截至2006年12月，该希望工程累计资助学生272名，全镇学生年入学率始终稳定在100%。邓平寿“说什么也不能让娃娃失学”的理念，已融入虎城血脉、深植群众心中，转化为家家户户的自觉行动，以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重教兴学、为民育人的初心在虎城传承延续。

在邓平寿的推动下，虎城教育取得了累累硕果：1998年至2006年，虎城镇

教育工作在梁平县人民政府的年度教育督导评估中连续9年获得一等奖；2000年10月，虎城镇成人学校获得国家教育部“中华扫盲奖”。

三、躬身实干，兴业富民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不在办公室。”“我坐在小车里，就是把群众关在车门外。”邓平寿经常这样说。为了更深入地了解 and 解决群众所思所盼，他坚持长年下村，还定下“三项制度”：赶场天必须在办公室接待群众，即使周末也不休息；冷场天干部必须下村；下村不准坐车。除非急事，邓平寿下村总是步行，一走就是几十里。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泥脚书记”“田坎书记”。在即使最热的天，邓平寿下村也不戴草帽，因为帽檐遮脸，他怕别人认不清他，也怕自己看不清人。因此群众给邓平寿下乡时的形象编了一首“四字歌谣”：不坐车子，不戴帽子，不摇扇子，手上有块汗帕子。

因为长期“泡”在基层的坚持，邓平寿摸清了虎城的资源禀赋，提出“田里饱肚子，土里挣票子”的产业富民思路。养蚕和种柚子是虎城的传统产业，但长期以来规模小、效益低。而邓平寿看到了其中的传统优势和巨大潜力，和镇干部反复研究，确定了“耍好一条龙（建成柚子产业带），壮大一根虫（发展蚕桑产业）”的举措，决心让传统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摇钱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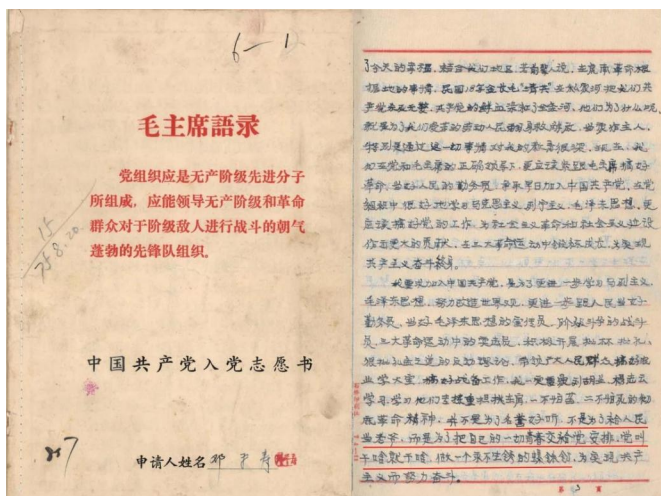
2000年，时任虎城镇党委书记

的邓平寿，两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虎蜜柚产业发展，与驻村干部赴礼仁村协调租用近16亩田土用于育苗，快速推动产业落地。为了种好虎蜜柚，邓平寿定期巡查基地，邀请县科委技术人员指导；自己主动学习嫁接技术，回家还反复试验。2004年，他家试种的虎蜜柚挂果见效，高兴的邓平寿立刻下村劝说群众栽种，接待访客时也不忘主动推介。如今，邓平寿牵头改良虎蜜柚的实验基地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平寿柚林”，虎蜜柚还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国家柚类金奖，远销全国各地及海内外。

为实现建设“蚕茧万担镇”的目标，邓平寿不仅鼓励妻子带头养蚕，自己更是认真学习桑树管护与养蚕技术。下村时，他身上的黄布挎包里总是揣着三样“宝”：蚕药、剪刀、技术资料。经过长期实践积累，邓平寿把自己也培养成了一个养蚕专家，时常深入田间地头，为村民现场示范、解答生产技术难题。到他去世前的2006年，虎城桑树种植面积



关心村民生产生活的邓平寿（右一）。



1974年12月25日，邓平寿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梁平区干部档案管理中心藏）。

近万亩，年养蚕2万余张，“一条龙”“一根虫”当年为虎城农民创收2000多万元。

除了发展特色农业，邓平寿还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助力企业发展，为虎城增收拓宽渠道。残疾人唐书权的砖厂销路不畅，邓平寿随身带一块红砖，逢人就宣传其硬度与成本优势，还以个人信誉为担保帮助企业贷款。为吸引广西谢裕明夫妇落户，他全程陪同考察，解决用电、招工等难题，甚至协调减免电力费用，过节邀请做客，帮忙联系孩子入学。邓平寿凭着这股韧劲，吸引了四川大竹、达县等地60余家企业到虎城落户。作为边远镇，他和领导班子成员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心血。

1998年邓平寿刚任虎城镇党委书记时，当地农民人均收入仅800元，至2004

年底，这一数值已突破2000元。他说：“我们考核争第一，其实是检验我们为老百姓办事够不够多，够不够好。”在他的带领下，虎城的各项工作连年在全县都名列前茅，镇党委、政府连续6年都受到县里的表彰。

四、结语

邓平寿在入党志愿书中这样写道：“我要求入党，不是为了名誉好听，不是为了给人民当老爷，而是为了把自己一切交给党安排，党叫我干啥就干啥，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用31载的坚守和宝贵的生命，兑现了这份滚烫的初心。

邓平寿同志的先进事迹与崇高品格，经由档案与方志的留存记载，既为历史存照，也为后世立范，成为巴渝大地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时代标杆。迈向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当以邓平寿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厚植人民情怀，以实干担当、无私奉献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让“田坎书记”的赤诚与担当在新时代的奋斗篇章中薪火相传。

（作者单位：梁平区档案馆）

责任编辑：周怡彤

国家级非遗铜梁龙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苏其善

巴渝大地，龙脉绵延。在重庆市铜梁这片浸润着两千余年历史文脉的土地上，铜梁龙以“中华第一龙”之誉，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生活的期许，历经岁月淬炼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明珠。从旧石器时代“铜梁文化”遗址的先民足迹，到商周图腾崇拜的原始龙舞；从唐宋龙灯的流光溢彩，到明清市井的喧闹盛景；从当代国庆盛典的惊艳亮相，到全球舞台的文化传扬，铜梁龙早已超越民间艺术的范畴，成为巴渝文化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龙文化传承发展的鲜活样本。

一、龙源溯古：从图腾崇拜到民俗生根

铜梁龙的起源，深植于中华龙文化的沃土，又镌刻着巴渝地域的独特印记。考古发现佐证，距今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铜梁便有人类繁衍生息，1976年“铜梁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不乏与原始祭祀相关的器物，为早期龙文化的萌芽提供了土壤。而中华龙崇拜可追溯

至商代，彼时龙舞已作为通神、求雨、祈福的重要仪式存在，甲骨文中“十人舞龙”的记载，便是最早的龙舞雏形。这种原始的图腾崇拜，随中原文化与巴渝文化的交融，在铜梁落地生根。

汉代是龙舞发展的“飞升期”，龙舞从单纯祭祀活动脱离，融入“百戏”成为独立表演艺术，“鱼龙曼衍”的大型龙舞盛况，为铜梁龙的发展奠定了艺术基础。此时，五色龙的概念已形成，青龙、赤龙、黄龙、白龙、黑龙对应五行方位，这种文化认知深刻影响了后世铜梁龙的色彩体系。隋唐时期，龙体内置烛火的“龙灯”形式出现，让龙舞在夜间表演更具视觉冲击力，这一创新被铜梁龙完整承袭，成为其核心特色之一。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勾栏瓦舍兴起，龙舞彻底融入民间生活，正月十五闹元宵、耍龙灯成为全民习俗。铜梁地处川东丘陵与平行岭谷交接地带，兼具中原文化与巴渝山地文明特质，龙舞在此期间与当地民俗深度融合，形成了“新春

耍龙、端午祭龙、旱时求龙、丰收庆龙”的完整习俗体系。清光绪《铜梁县志·风俗篇》明确记载：“上元张灯火，自初八九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灯、狮灯及其他杂剧，喧闹街市，有月逐人，尘随马之观。”民间更流传“大足朝佛，铜梁观灯，合川看春”的俚语，足见当时铜梁龙灯的鼎盛之势。

明清两代，铜梁龙舞形成专业组织与固定程式，舞龙者需掌握圆场功、臂力控制、摆字技巧等专业技能，甚至出现雇佣性质的舞龙队，标志着铜梁龙从民俗活动向艺术门类的成熟转变。这一时期，铜梁龙的造型、舞法逐渐定型，龙头威武雄浑，龙身灵动舒展，表演套路兼具观赏性与仪式感，为近现代铜梁龙的崛起埋下伏笔。

二、文脉赓续：从蛰伏重生到享誉

世界

二十世纪中叶，铜梁龙曾历经短暂蛰伏，直至198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春风吹拂，这颗文化明珠才重焕光彩。1983年，铜梁龙舞在重庆解放碑表演震动山城；1984年，多达35节的铜梁大龙首次登上北京国庆35周年庆典舞台，巨龙翻江倒海、气势磅礴，让全国人民记住了“铜梁龙”的名字；1988年，铜梁舞龙队斩获全国龙舞大赛冠军，为日后铸就“中华第一龙”文化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数十年，铜梁龙开启“腾飞之路”，成为国家文化名片。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大典，铜梁龙灯彩扎世家周均安、周建、周合平父子扎制的大龙惊艳亮相；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铜梁龙舞与全球观众共襄盛举。近年来，铜梁龙先



铜梁大型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剧照

后登上央视春晚、中华龙狮大赛等舞台，远赴美国、英国、保加利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文化交流。2006年“铜梁龙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铜梁龙灯彩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凭借铜梁龙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广泛的影响力，铜梁收获多项国家级地域文化荣誉，成为龙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先后被命名为“中国龙灯龙舞之乡”“中国龙狮运动名城”。2021~2023年再度获评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龙灯龙舞）之乡”。同时，铜梁龙入选重庆十大文化符号，成为重庆地域文化的代表。

三、龙形百态：品类繁盛的艺术谱系

铜梁龙并非单一形态，而是形成了品类齐全、特色鲜明的艺术谱系，按功能可分为表演龙灯、景观龙灯、工艺龙灯三大系列，按形制与表演形式细分则有上百个品种，其中以正龙、火龙、彩龙、板凳龙、稻草龙、大蜈蚣最具代表性，每个品种都有其文化内涵与表演场景。

（一）正龙：铜梁龙的“形象标杆”

正龙是铜梁龙的核心品类，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标准龙”，1995年被国家体委定为全国舞龙比赛标准龙具。其造型遵循“威武雄浑、灵动大气”的原则，龙头高约1.5米，宽1.2米，龙角挺拔、双目圆睁、龙须飘逸，龙嘴可张可合，

内置龙珠栩栩如生。龙身一般长20~30米，分12节（对应12生肖）或24节（对应24节气），象征天地有序、岁月轮回。龙鳞色彩艳丽，以红黄为主色调，辅以青蓝白黑，既契合五行文化，又彰显喜庆氛围。正龙表演庄重典雅，多用于重大庆典、节日巡游，是铜梁龙“正统”形象的体现。

（二）火龙：铁水钢花中的生命之舞

火龙是铜梁龙最具震撼力的品类，被誉为“盛世奇龙”，其独特之处在于与“打铁花”技艺结合。夜幕下，舞龙者赤裸上身，赤脚起舞，手持火龙穿梭于1500℃的铁水钢花之中，钢花飞溅如漫天星辰，火龙翻腾似烈焰游龙，形成“人在火中舞，龙在花中飞”的壮观场景。火龙的龙身以坚韧布料制成，表面涂抹防火材料，龙头扎制更为坚固，既能承受钢花冲击，又不失灵动。火龙起源于先民对火神的崇拜，最初用于驱邪祈福，如今成为铜梁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常作为文化旅游演出的压轴节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巴渝儿女的豪迈与勇敢。

（三）彩龙：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

彩龙以色彩绚丽、装饰精美见长，是铜梁龙灯彩扎工艺的集中体现。龙身采用绸缎、丝绸等高档面料，彩绘龙凤呈祥、花鸟鱼虫等吉祥图案，辅以亮片、流苏、彩灯等装饰，夜间表演时龙体内置LED灯或传统烛火，流光溢彩，熠熠生辉。彩龙的表演节奏舒缓优美，动作细腻灵动，多与舞蹈、音乐配合，适合

节庆巡游、室内演出等场景，尽显铜梁龙的柔美与精致。

（四）板凳龙：乡土气息的民间智慧

板凳龙是铜梁龙中最具乡土气息的品类，源于农家日常使用的板凳，体现了民间艺术的质朴与智慧。其制作简便，以长板凳为基础，在凳面扎制龙头、龙尾，凳腿作为龙身支撑，2~3人即可表演。板凳龙表演灵活多变，可单人独舞，可多人组队，动作诙谐活泼，贴近生活，多用于乡村庙会、邻里欢聚等场景，是铜梁龙“雅俗共赏”特质的生动体现。

（五）稻草龙：就地取材的生态之美

稻草龙以秋收后的稻草为主要原料，先以竹篾扎制骨架，再用稻草编织龙鳞、龙身，龙头以稻草捆扎塑形，通体金黄，充满田园气息。其制作遵循“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原则，体现了先民的生态智慧，表演时动作粗犷豪放，充满丰收的喜悦，如今常作为非遗展示、农耕文化节的特色项目，传递传统农耕文明的魅力。

（六）大蜈蚣：气势磅礴的巨型龙舞

大蜈蚣以“长”著称，龙身可达50米以上，最多可达上百节，需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协同表演。其龙头硕大威武，龙身蜿蜒绵长，表演时百人同舞，巨龙缓缓蠕动，盘旋翻腾，气势磅礴，尽显“中华第一龙”的雄浑气魄。大蜈蚣多用于大型庆典活动，如国庆、龙灯艺术节开幕式等，是铜梁龙气势的极致展现。

此外，铜梁龙还有荷花龙、水云龙、竹梆龙、竞技龙、鲤鱼跳龙门、龙凤呈祥、蚌姑戏沙弥、猪啃南瓜等众多特色龙灯，或取材独特，或寓意吉祥，共同构成了品类繁盛、异彩纷呈的铜梁龙艺术谱系。

四、独树一帜：铜梁龙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铜梁龙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华龙文化的代表，源于其造型之美、舞法之活、文化之深三大核心特色，既符合中华龙文化的共性审美，又兼具巴渝地域的独特气质。

（一）造型之美：

形神兼备，刚柔并济

铜梁龙的造型遵循“形神兼备”的原则，在形态上兼具“威、雄、灵、美”四大特质。“威”体现在龙头造型，龙角挺拔、双目炯炯、颞部宽阔，彰显龙的威严；“雄”



铜梁龙舞：大蜈蚣

体现在龙身修长、比例协调，翻腾间尽显磅礴气势；“灵”体现在龙身灵活、关节灵动，表演时如活龙现世；“美”体现在色彩搭配与装饰细节，红黄为主色调彰显喜庆，彩绘纹样蕴含吉祥如意，亮片流苏增添灵动。

在制作上，铜梁龙突破传统龙具的厚重局限，通过选材优化与工艺改良，实现“轻巧便捷、易于造型”。1995年成为全国舞龙比赛标准龙具，正是因其造型规范、舞动灵活，既适合专业表演，又便于普及推广，这种“形神兼备、刚柔并济”的造型风格，成为铜梁龙区别于其他地域龙舞的核心标识。

（二）舞法之活：套路丰富，动静相宜

铜梁龙舞的核心魅力在于“活”，表演套路丰富多样，既有刚劲有力的雄浑之姿，又有细腻灵动的柔美之态，形成了“快、慢、刚、柔、腾、挪、翻、转”八大核心技法。专业舞龙队需掌握圆场功、臂力控制、步伐协调等基础技能，更要熟练运用“龙出宫”“龙摆尾”“龙打滚”“龙盘柱”“金龙抱柱”“游龙戏珠”等经典套路。

铜梁龙舞的独特之处在于“摆字舞龙”，舞龙者通过精准的步伐与配合，让巨龙在运动中摆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盛世中华”等吉祥文字，将视觉表演与文字寓意完美结合，既考验团队协作，又增添文化内涵。此外，火龙的“火中舞”、彩龙的“灯中舞”、板凳龙的

“趣中舞”，各有其表演技法，动静相宜，张弛有度，让观众在不同场景中感受铜梁龙的多元魅力。

（三）文化之深：承载民俗，凝聚精神

铜梁龙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巴渝民俗与民族精神的载体。从文化内涵来看，其一承载祈福纳祥的民俗诉求，新春耍龙盼风调雨顺，端午祭龙祈平安康健，早时舞龙求甘霖普降，丰收庆龙贺五谷丰登，龙舞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二蕴含五行文化，五色龙对应五行方位，体现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其三彰显巴渝精神，火龙表演中的不畏艰险，大龠龙表演中的团结协作，正是巴渝儿女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的精神写照；其四传承家国情怀，从国庆盛典到奥运舞台，铜梁龙始终以“中国龙”的姿态亮相，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五、匠心筑龙：铜梁龙灯彩扎工艺的千年传承

铜梁龙的惊艳亮相，离不开匠人精湛的龙灯彩扎工艺。这项技艺以竹子、布料为核心原料，其工艺核心可概括为“选材、扎架、裱糊、彩绘、整装”五大核心工序，经上百道工序手工制作而成，每一步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

（一）选材：因地制宜，精益求精

铜梁龙彩扎选材讲究“就地取材、因材施艺”，核心原料以当地竹子为主，辅以布料、颜料、棉纸等辅料。竹子是扎架的核心材料，需选用2~3年生的慈

竹与斑竹，慈竹韧性好，适合扎制龙身骨架。斑竹质地坚硬，用于制作龙把，确保握持稳固。选竹时需挑无虫蛀、无裂痕、粗细均匀的竹子，砍伐后阴干半月，去除水分，避免变形开裂。布料多选用绸缎、丝绸，质感柔软且色彩鲜艳，适合裱糊龙身；颜料采用矿物颜料或高品质丙烯颜料，确保色彩持久不褪色；辅料包括铁丝（加固骨架）、棉纸（缠裹铁丝防滑）、乳白胶（粘贴固定）、亮片（装饰点缀）等，每一种材料都有严格标准。

（二）扎架：造型之本，匠心塑形

扎架是龙灯彩扎的基础工序，决定龙的整体造型，尤以龙头扎制最为复杂，需经二十道小工序。第一步划篾条，将竹子劈成粗细均匀的篾条，细篾用于造型，粗篾用于承重；第二步扎制骨架，先用铁丝搭建龙头、龙身、龙尾的大致框架，再用篾条精细编织，龙头需突出

龙角、龙眼、龙嘴的立体感，龙身每一节都要保证圆润对称，龙尾需轻盈灵动；第三步加固定型，用棉线将篾条与铁丝紧密捆扎，关键部位用铁皮、螺丝加固，确保骨架稳固且便于舞动。扎架过程中，匠人需凭借经验把控比例，确保龙头威武、龙身修长、龙尾灵动，无固定图纸全凭心手相传，这正是传统工艺的精妙之处。

（三）裱糊：细腻平整，牢不可破

裱糊是连接骨架与装饰的关键工序，需保证表面平整、贴合紧密。先将布料或棉纸裁剪成合适尺寸，用稀释后的乳白胶均匀涂抹在骨架上，再将布料平整粘贴，龙身每一节的衔接处需无缝贴合，避免舞动时脱落。龙头、龙角等细节部位需多层裱糊，增强韧性。龙嘴内部需单独裱糊，确保开合灵活。裱糊完成后需阴干，避免阳光直射导致变形，这一步考验匠人的耐心与细致，稍有不慎便会影响整体效果。

（四）彩绘：点睛之笔，彰显神韵

彩绘是铜梁龙彩扎的点睛之笔，直接决定龙的视觉效果。彩绘遵循“先勾线、后填色、再装饰”的流程，先用墨线勾勒龙鳞、龙须、龙爪的轮廓，线条需流畅有力。再填充底色，以红黄为主，搭配青蓝



铜梁区龙灯彩扎艺人为大蟠龙进行龙头彩绘

白黑，色彩对比鲜明。最后绘制细节，龙鳞需层层叠加，体现立体感。龙眼用黑色点睛，辅以白色高光，让龙目炯炯有神。龙嘴内部绘制红色舌纹，增添生动感。彩绘无固定纹样，匠人可根据需求创作吉祥图案，如龙凤呈祥、祥云缭绕等，既遵循传统，又兼具创意，每一条龙的彩绘都独一无二。

（五）整装：细节把控，完美呈现

整装是彩扎工艺的最后一步，需对龙灯进行全面检查与完善。首先安装龙把，确保高度适中、握持舒适。其次检查龙身衔接，确保舞动时灵活无卡顿。最后加装装饰，如龙须、流苏、亮片等，提升整体美观度。对于火龙，需在龙身涂抹防火材料。对于彩龙，需安装内置灯具。整装完成后，匠人会亲自试舞，调整细节，确保龙灯既美观又实用，真正实现“形神兼备、舞动自如”。

铜梁龙灯彩扎形成三大流派。周氏彩扎流派，发源地为太平镇，为 mainstream 流派。第一代，周均安（清末至民国，首创翘篾龙头工艺，奠定铜梁龙灯彩扎根基）；第二代，周生超、周生全（承袭古法，完善形制工艺）；第三代，周合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重庆工艺美术大师）、周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巴渝工匠）、周千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第四代，逯德军（周建弟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付氏彩扎流派，发源地为安居镇，代表为付泉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李氏彩扎流派，发源地为安居镇，代表为李诗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近年来，铜梁龙灯彩扎工艺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当代传承人引入现代技术，减轻龙头重量，优化色彩工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传承人曹胜琼成立女子扎龙厂，将技艺带入校园，培养青少年传承人。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让千年技艺焕发新生。

铜梁龙灯彩扎已成为富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全区现有龙灯彩扎厂1个，龙灯彩扎车间1个，龙灯彩扎基地6个，民营龙灯彩扎企业11家，开发龙灯系列产品120种，常年从事龙灯彩扎的技术人员200余人、从业人员700余人。龙灯灯组、牌坊、彩扎品、龙绣等龙灯制品进入国内外市场。太平镇坪漆村打造“龙灯之村”，太平镇坪漆村龙灯彩扎厂被评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就业工坊，被重庆市文旅委授牌为“市级文化产业基地”。黄桷门龙灯彩扎基地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彩灯艺术专业委员会授牌为“铜梁龙灯彩扎基地”。

六、龙腾盛世：铜梁龙舞的表演艺术与传承发展

铜梁龙舞是“扎制”与“舞动”的完美结合，既是技艺的展示，也是文化的表达。经过数百年发展，铜梁龙舞形成了专业规范、全民参与、与时俱进的传承发展格局，成为兼具艺术性、观赏性、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一）表演艺术：技艺精湛，意境深远

铜梁龙舞的表演注重“形、神、韵”的统一，表演者需具备扎实的功底与默契的配合。专业舞龙队一般由12~24人组成（对应龙身节数），1人持龙珠引导，其余人持龙节舞动，龙珠是龙的“灵魂”，龙珠的腾挪跳跃引导巨龙做出各种动作，形成“珠引龙随、龙追珠行”的灵动效果。

表演时，舞者需掌握三大核心要领：一是步伐精准，以圆场步、碎步、弓步为主，保证龙身连贯不脱节；二是力道适中，龙头舞者需掌控方向与节奏，龙身舞者需保持力度均匀，让龙身呈现波浪状起伏，尽显灵动；三是配合默契，百人舞大龠龙时，需听从统一指挥，步调一致，才能让巨龙整齐翻腾。

铜梁龙舞的表演场景丰富多样，节庆表演以热闹喜庆为主，多在春节、元宵等节日进行巡游，搭配锣鼓、唢呐等民乐，营造欢乐氛围。专业演出注重艺术呈现，融入舞蹈、音乐、灯光等元素，如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以山水为舞台，展现铜梁龙的千年历史。外事演出则突出文化特色，以火龙、正龙等为代表性的品类远赴海外，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铜梁龙舞表演形成两大流派。传统民俗派，为大龠龙、火龙、正龙传统套路。民国时期以沈俊声、赵海涛为代表，固化传统龙舞民俗套路；当代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廷炎为代表，融川剧、武术入龙舞，创编传统全套套路+国标竞技套路。火龙专项以周可吉（传统火龙总教头）、李诗敏、尹榜为代表。竞技套路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成型，为全国龙舞竞赛标准，奠基人黄廷炎创编国家龙舞竞技规定套路。代表传承人有梁志春、王弟福等。

全区有铜梁龙舞训练场所、办公用房等建筑1万多平方米，创编龙灯舞蹈品种34个，开发龙文化产品有龙石雕企业2家，龙绣企业1家，龙文化创意企业12家，常年从事龙文化文创产品业的技术人员200余人，产业从业人员1000人。注册从事龙舞培训和展演的团体和企业14家，培育民间龙舞艺术表演团队35支，常年从事龙舞表演的从业人员3300余人。

（二）传承发展：多措并举，薪火相传

铜梁龙文化构建了“政府主导、传承人主力、全民参与”的传承体系。铜梁龙舞和龙灯彩扎等2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铜梁龙灯会（民俗）、铜梁龙灯彩扎工艺（传统美术）、铜梁火龙（传统舞蹈/民俗表演）、铜梁彩灯舞（传统舞蹈）、铜梁小龠龙（竞技龙）等5项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铜梁荷花龙舞、板凳龙舞等86项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代表人中，黄廷炎（龙舞）、梁志春（龙舞）、周合平（龙灯彩扎）被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建、李诗敏、

逯德军、王弟福、王星富等14人被评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千明、蔡明灿、何令、李廷刚等74人被评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推动全民普及，在全区中小学开展龙舞进校园活动，编写校本教材，培养青少年传承人，组建中小学舞龙队100余个，接受龙舞艺术知识普及和培训的学生5万余人，常年保持学生舞龙队50支。创新艺术创作，打造《龙把子》《铜梁焰火龙》等精品节目，斩获群星奖、山花奖等国家级奖项，让传统艺术焕发时代活力。搭建展示平台，常态化举办中华龙狮大赛、龙灯艺术节、安居龙舟赛等节会赛事，让铜梁龙在交流中发展。

以龙文化为核心，推行“龙文化+”行动，推动铜梁龙从非遗技艺向全产业链延伸，形成“彩扎制作、演艺表演、文创开发、文旅融合”四位一体的产业格局，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双赢。从龙灯制作到演艺表演，再到相关文化旅游产业，铜梁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除国内外大量龙灯彩扎和龙舞表演订单外，玄天湖、安居古城、铜梁龙景区、家泽田园等成为龙舞创收的天然舞台。此外，铜梁还搭建全国首个中华龙文化数据库，成立中国群文学会龙灯龙舞专委会，编纂《铜梁龙灯会探秘》等8部文集，从理论层面推动龙文化研究，为产

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铜梁龙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已成为富民强区的重要支柱产业，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绽放。

千年岁月流转，铜梁龙从远古图腾走来，在民俗沃土中扎根，在时代浪潮中腾飞。它承载着巴渝先民的智慧与期许，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怀，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也是地域文化的名片，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从精湛的彩扎工艺到灵动的舞龙表演，从民间习俗到产业集群，铜梁龙的每一次蜕变，都是传承与创新的完美融合。每一次亮相，都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展现。

如今，铜梁龙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行走在田间地头、城市舞台、国际赛场，让更多人感受中华龙文化的魅力。随着非遗保护的不断深化、产业链条的持续完善，这颗千年文化明珠必将绽放更耀眼的光芒，在新时代续写“龙腾盛世”的崭新篇章，继续承载中华文化的使命，在国内舞台续写辉煌，在国际舞台传递中国声音，让中华龙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铜梁区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伟

綦江僚人文化：历史传承与方志意义

王凤琳 周 铃

僚人文化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深入探究僚人文化，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色，挖掘更多关于古代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从而丰富我国的历史文化宝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成果既充实方志内容，填补旧志记载空白，也为加强修志实践总结和方志理论研究、推动全国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提供了鲜活案例与理论参考。同时，僚人文化研究也为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有助于促进地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綦江僚人文化的历史渊源

僚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依据史料来看，“僚”这一族称始于东汉安帝时期^①，约于南宋末年消亡。僚人上承百越，下启近现代壮泰族群^②，越——僚族团历经历史分化、重组、演化，形成现今的壮泰族群^③。壮泰族群约30个，8000万人，分布在8个国家^{④⑤}。

在唐代僚族群体中，南平僚无疑是最为强大的一支。南平僚，亦称南川僚，其名称源自古地名“南平”与“南川”

① 景亭湖译著：《濮祖经》，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05~408页。

② 王国祥：《齐心合力创僚学》，《僚学研究（第一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5月。

③ 王国祥：《南平僚族属证明法：探寻僚语底层并与壮泰语族比较》，《僚学研究（第二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11月。

④ 王国祥：《齐心合力创僚学》，《僚学研究（第一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5月。

⑤ 王国祥：《南平僚族属证明法：探寻僚语底层并与壮泰语族比较》，《僚学研究（第二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11月。

(非现代所指的南川)。显而易见,南平(南川)僚指的是居住于南平(南川)地区的僚人。该地名与綦江或重庆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今,在綦江地区,从明清至近代的众多墓志碑刻中,频繁出现“南平”、“古南平”、“南川”等字样,碑文内容揭示了这些称谓在古代指的是现今綦江地区的某个范围。此外,历史文献亦提供了佐证,如《輿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五》所载,渝州在唐武德元年被更名为南平郡,乾德五年废除南平县并将其纳入管辖^①,而綦江在唐代属于南州南川郡南川县^②。宋熙宁八年,在恭州南川县铜佛坝(即今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一带)设立了南平军^③。《旧唐书·南平僚传》中亦有记载,南平僚“东邻智州,南接渝州,西连南州,北靠涪州,部落达四千余户。”^④基于这些描述,学者们进行了专门的考证,认为南平僚的分布范围大致为渝南黔北地区。具体而言,东至重庆黔江、酉阳、彭水一带,南至贵州遵义正安、道真、桐梓、务川一带,西至重庆綦江一带,北至重庆涪陵一带,涵盖了金佛山、黑山、柏枝山以及綦江东溪、赶水、綦江河等地^⑤。

从东汉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南平僚在綦江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到了唐太宗贞观三年,南平僚的首领“剑荔王”派遣使者携带铜鼓作为礼物,向唐朝表达了归顺的意愿^⑥。从那以后,在历史的长河中,綦江地区的僚人经历了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融合和交流,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篇章。

1994年,在万盛城区附近的三官桥,出土了一块南宋初年的墓志铭——《宋太夫人陈氏墓铭》。墓志铭字迹清晰,现保存在万盛经开区博物馆里。墓铭在介绍墓主家庭生活时有这样一句:“一日因馆客夜饮,随行僚奴不解虞慎,因火其家,仓困囊橐荡然泯焉,生理方萧索……”这说明了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次平定僚人的叛乱之后,此地劫后余生的不少僚人,已被迫沦为奴婢。“僚”古称“獠”,这里既有“獠奴”,说明僚人早就土生土长在这里。

2018年,綦江区人民政府将区内部僚人文化遗址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⑦,綦江的僚人文化遗址大致分布在打通、石壕、赶水、郭扶等街镇。根据用

① (宋)王象之:《輿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4543页。

② (清道光)罗星:《綦江县志·卷二建置》。

③ 张文耀:《万历重庆府志》。

④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西南蛮·南平僚》,上海人民出版社。

⑤ 余道勇:《古“南平僚”略考》,《重庆地方志》,2024年第4期。

⑥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第六册·旧唐书》,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1月,第4539页。

⑦ 綦江府发[2018]29号文件。

途，綦江目前发现的僚人文化遗址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古墓葬，如双河塘崖墓、皇帝坟、倒埋坟。双河塘崖墓修建于光和四年（181年）七月七日，墓门外的鱼鳧、鱼、蚂拐和巫师等画像，学术研究价值极高；皇帝坟建于宋代，相传最后一位夜郎王后裔——僚王被剿杀，埋葬于此，墓门上横梁所雕葫芦、柱子等纹饰是研究僚人文化的珍贵资料；倒埋坟是僚人将死者“头枕石门脚登山”的倒埋葬式，民间有“横苗倒仵佬”之说。

二是宗庙祭祀遗址，如都府庙、天神坛、铜鼓殿、小铜鼓殿、大僚祠、小僚祠。都府庙内供奉牛王，是僚人对农耕重视的见证，牛王节，现在依然是与僚系族群，如壮、侗、仡佬、仡佬等民族祭祀牛神的传统节日；天神坛，是僚王祭祀天母大神的祭坛；铜鼓殿曾是望乡台上一座供奉铜鼓的鼓楼，铜鼓是僚王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小铜鼓殿也是僚人供奉铜鼓的神圣场所，铜鼓已无踪影，殿内仅存一尊牛王石刻造像；大僚祠，曾是僚王家族宗祠所在地；小僚祠，曾是僚人贵族供奉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的场所。

三是生产遗址，如大僚湖、彭家岩兰干门遗址、花儿岩兰干门遗址、兰干滩遗址、染坊遗址。大僚湖是僚人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彭家岩兰干门遗址和花儿岩兰干门遗址是商人购买兰干细布必经之地，曾是僚王收税的重要通道；

兰干滩遗址，相传为僚人生产细布的地方；染坊遗址是僚人给僚布染色、制图的场所，其后僚王便精选上等僚布作为贡品，进献朝廷。

四是生活居住遗址，如大僚坝、僚人谷、三合嘴遗址。大僚坝是夜郎王后裔率族人隐姓埋名、繁衍生息的地方；僚人谷是僚王宫所在地，宋灭僚，失于火，现仅遗址；三合嘴遗址曾是僚人议事或解决争端的场所。

綦江地区依托于其独特的僚人文化遗址优势，与渝南黔北地区紧密合作，深入挖掘南平僚文化的历史底蕴。此外，该区域积极联合国内外致力于僚系族群研究的学术力量，成功组建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僚学研究中心。该中心致力于解开历史谜团，自成立以来，已成功举办四届僚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和十届学术年会，并指导当地政府成功筹备八届中华僚人文化吃新节。这些学术及文化活动不仅对僚人的起源与流变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而且将学术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动力。

二、綦江僚人文化的特征

綦江僚族文化展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其主要表现形式涵盖居住建筑、服饰风格、丧葬仪式及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具体阐述如下。

（一）居住建筑

僚族居民多栖息于干栏式吊脚楼之中，此类建筑通常选址于悬崖边缘或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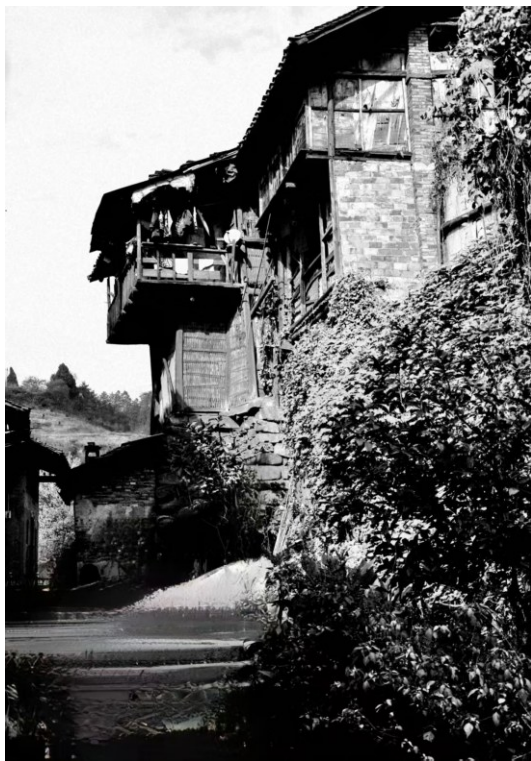
地,具备良好的防潮和防虫功能,以适应西南地区湿润且闷热的气候条件。据王国祥教授的研究指出,“干兰”一词源自僚语,它概括了越——僚系民族共有的建筑文化特征^①。

《魏书·獠传》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新唐书·南蛮传》亦载:“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兰’。”至今,在僚人曾经的聚居地,干兰建筑的遗风犹存,例如重庆地区的吊脚楼、泰国北部的干兰民居、云南傣族

的干兰住宅以及湖南省通道县芋头寨侗族干兰住宅等。此外,文物遗迹亦揭示了这种文化传承的脉络,如綦江东汉崖墓上的干兰图像所示。通过文献记录、民俗调查以及考古发现等途径,均可观察到僚人居住干兰的民俗特征。然而,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及时代的演进,不同地区的僚族干兰建筑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例如,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前的建筑保留了檐口弧形、山墙入口处开门的特色^②;二十世纪,綦江地区的许多民居被称为“竹楼”或“高脚屋”;与僚人有族源关系的傣族,其居住的三角形干兰,屋顶呈两面坡且棱角分明,房屋悬空形成“楼”,与綦江东汉崖墓上的干兰图像极为相似^③。

(二) 服饰文化特征

包头巾、穿花鞋、喜银饰,妇女多穿通裙、男子左衽。《太平寰宇记》:“女衣斑布”“短衣左衽。”《旧唐书·南平僚传》:“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新唐书·南平僚传》:“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贵者饰以珠珙。”此为史籍中对南平僚女性服饰最早的记录。綦江横山二蹬岩崖墓中存有 两幅岩画,描绘了七位女性身着通裙舞蹈的场景,亦有泰、老、傣族



郭扶干栏建筑(拍摄于2014年)

① 王国祥:《从建筑文化角度追溯僚人与壮傣老泰诸族的族源关系》,《南州文史》,2010年第2期。

② 金奕:《海南黎族干栏式建筑源流研究》,《美与时代》(城市版),2022年第8期。

③ 王国祥:《从建筑文化角度追溯僚人与壮傣老泰诸族的族源关系》,《南州文史》,2010年第2期。

女性将通裙系于乳际，甚至赤裸上身的装束；通裙的穿着方式为从头部套下。西双版纳的傣族与泰国的泰族女性至今仍流行穿着通裙进行歌舞。贵州仡佬族所着“披袍”，即为古代僚人所穿的贯头衣。《蜀中广记》引《文献通考》：“女子绾发撮发以饰簪。”僚人妇女绾髻于脑后，亦有置于头顶者，而泰傣女性则将发髻绾于头顶或稍偏，如西双版纳猛罕女性的孔雀髻。二十世纪中期，在西双版纳仍可见傣族女性使用小竹管穿耳垂，与僚族女性的习俗如出一辙。《新唐书·南平僚传》：“男子左衽，露发，徒跣。”《蜀中文记》引《文献通考》：“男子用白练缠头，衣尚青碧”。綦江崖墓中刻画的男性形象露发、赤足。观察图像，男性亦有绾髻并以长条布裹头的装束。唐代《云南志略》载傣族以红缯布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此俗至今犹存。二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乡村中偶见老翁绾髻。此皆为僚人遗留之风俗，至80年代在傣族地区仍可见。綦江东汉崖墓刻画有戴尖顶笠的人物，云南新平傣族女性几乎日日戴笠，笠亦为尖顶。

本研究选取的通裙布料为麻布，亦称斑布，源自唐代南州（今綦江）向朝廷进献的贡品。在大僚坝至丹溪地区，麻类植物的种植极为普遍，僚人擅长种植麻，并

利用其纤维织造布匹，所制得的布料即为麻布。麻布作为一种由麻类植物纤维制成的布料，其特点在于质地柔软、舒适、透气性佳、清爽、耐洗涤、耐日晒、防腐蚀以及具有抑菌性能，尤其以卓越的韧性著称。通裙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仅需两块尺寸适宜的麻布，通过中间缝合一根麻绳，将麻布分别缠绕于上身和下身，即可完成通裙的制作，整个过程简便易行。

（三）丧葬习俗

僚人有一种独特的竖棺葬俗。据《酉阳杂俎》记载：“僚人死后，采用竖棺的方式进行埋葬。”《魏书·僚传》亦有相似记载：“死者以竖棺方式埋葬。”在信宜水口镇马岭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研究者们发现了7座船形竖穴土坑墓葬。这些墓葬在保持了“越人墓”狭长特征的同时，展现出原始而神秘的风貌：



位于綦江区郭扶镇大僚坝的皇帝坟

其长宽比超过4:1,三米半长的墓葬形制相较于“越人墓”有所改进,两端呈圆角,形似扁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葬与同期汉人墓葬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墓坑底部中央设置的腰坑(商周文化元素),内含圜底钵、双耳盆等随葬品。

僚人还有崖葬习俗。包括崖墓葬、悬棺葬。汉至隋唐僚人在綦江留下了大量依山傍水的崖墓群。綦江崖墓上多见“为夫作石”的刻字。泰傣民族已改变葬制,行火葬、土葬、水葬。《百夷传》和东南地方志书有傣族葬俗的记录,如:“娱尸”、掷生鸡蛋卜圻所、不立坟茔、不祭扫。

(四) 犬神崇拜

僚人对犬类持有深厚的敬仰之情,将其视为神圣的存在,并禁止食用犬肉。这种信仰可能源自于与僚人起源相关的神话传说——盘瓠的故事。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沅水》中亦有记载:“盘瓠死,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赐以名山,其后滋蔓,车曰蛮夷。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盘瓠被视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传说在远古高辛帝时期,有一只毛色五彩的犬名为盘瓠。因吴将军作乱,高辛帝承诺谁能斩

下吴将军首级,便封邑赏金并许配公主。盘瓠成功斩下吴将军首级而归。后来,高辛帝无奈之下,将女儿许配给盘瓠。盘瓠去世后,其后代繁衍,被称为蛮夷,成为中族,人们共同尊崇他们为祖先。此故事在我国南方民族中广泛流传,当时原住民虔诚地祭祀盘王。《魏书·僚传》载:“大狗一头,买一生口。”表明僚族对犬的珍视程度之高,甚至一头大狗可换取一人。在綦江境内,许多地名与犬神崇拜的习俗相关联,例如僚王墓的埋葬地被称为“狗圈岩”,僚人聚居地之一名为“花二岩”,其中“花二”即为犬的土语。在称谓习惯上,綦江居民偏好将儿童称为“蛮蛮”或“狗儿”,这些均体现了僚人对犬类的崇拜习俗之遗风。

(五) 贵铜鼓

铜鼓作为僚族部落的象征,其历史地位在《魏书·僚传》中提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此处所指“鼓”即铜鼓,它象征着僚族部落中极高的权力地位,部落首领通过铜鼓召集族人,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述:“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铜鼓不仅是权力的标志,其功能亦十分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军事行动、警报、祭祀活动、驱逐野兽、镇压邪灵以及娱乐等。《蜀广记》引用唐人陈羽键的诗句“为城下闻夷歌”中表达了“此夜可怜江上月,夷歌铜鼓不胜愁”的情感。《云南通志》记

载：“凡丧祭，夷人击铜鼓为号，亲友闻声必至。葬，孝子先以鸡蛋祷灵前，左手持往山卜地，如死者不愿，打在地，遇水石不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有记载：“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太平御览》亦有“僚人不解丝竹，唯坎（击打）铜鼓”的记载。而今，僚系民族如壮、布依、仡佬、傣等族聚居的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皆有铜鼓出土，在綦江安稳也发现过一面麻江型铜鼓。

铜鼓在僚族部落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在僚族聚居地出土，亦有以铜鼓命名的地理实体，例如江西的铜鼓县、海南的铜鼓岭、广东的铜鼓嶂。在重庆，綦江的铜鼓殿、铜鼓滩、铜鼓闹等地名亦因此得名。铜鼓殿位于綦江区郭扶镇团结村，道光《綦江县志》收录了陈洪宪的《游铜鼓殿》诗：“危岩踞千里，腰足不知倦。俯视众峰峦，齐烟但隐现。云雾生幽壑，疑即蛟龙变。山灵知我来，空中作雷电。忽闻响蒲牢，穿林寻佛殿。高僧揖我人，与我初谋面。如来不须参，弥勒何必见。是时春方深，呢喃语梁燕。墙外花缤纷，阶前草葱蒨。僧廊曲折通，一一游览遍。我闻诸葛公，

南天远征战。五月渡沪江，军中挥羽扇。铜鼓二千年，销磨等飞霰。望古感茫茫，幸逢时清宴。何当结良友，同来栖竹院。挥谢尘俗人，生涯弄笔砚。”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铜鼓殿位于高山云雾缭绕的竹林深处，居高临下，有“一览众山小”的视野。居住于此的僚族人民拥有两千年的历史，诸葛亮南征时曾对这一带实行过“和抚”政策，綦江区打通镇吹角坝发现的汉卢丰碑便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綦江僚人文化的独特之处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招婿、产翁、生殖崇拜、嗜酸等诸多特色。

三、綦江僚人文化的方志学价值

（一）有关僚人的记载的方志文献

众所周知，僚人作为古代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民族群体，在历史文献中有着丰富的记载。

首先，对其读音的记载。在史家笔下，作为少数民族，僚人的记载由最初的“獠”，逐渐转变为“僚”，指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在这个义项下，它的读音为“lǎo”，《说文解字》^①《玉篇》^②《太平玉览》^③《广韵》^④等音韵学著作对其做了说明。

其次是对其历史风貌的记载。《魏

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570页。

②（南朝）顾野王：《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年9月，第433页。

③（北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590页，第1638页。

④（北宋）陈彭年，丘雍：《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第281页。

书·獠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周书(异域·僚传)》《隋书·南蛮传》《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以及《新唐书·南蛮传》《宋史·蛮夷传》等均设有专门章节对僚人进行记述。这些史书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僚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结构、政治组织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北史》《南史》《明史》《资治通鉴》以及《三国志·蜀志》等史籍亦间杂有僚人的相关记载,虽然这些记载较为零散,但它们为研究僚族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同时,诸如《博物志·异俗》《水经注》《通典》《太平御览·四夷部》《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等专门著述,以及《华阳国志·南中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蜀鉴》《云南志略》《广州记》等方志,均对僚人有所记载。这些著述和方志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支系的僚人进行了描述,提供了关于僚人地理分布、经济活动、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信息。

具体涉及到綦江及周边的僚人,有明成化《重庆郡志》^①、清戴纶喆于光绪至宣统年间所撰《四川綦江县续志》^②,对该地僚人略有论述。

针对僚人历史的文献与方志记载,尽管存在大量书目,但具体到綦江及周边区域的地方志书,相关记载则相对零散,未能形成系统、连贯的叙述。基于

此,当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应重视僚人文化的记载,明确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记录当代人们保护和传承僚人文化遗产的行动,不仅可弥补旧志记载的不足,也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文献。这既是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所在,也是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路径。

(二) 僚人文化在方志学中的意义

僚人文化在方志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显著的历史研究价值、强大的文化认同凝聚力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属性,从多个维度为地方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注入了持续动力。

第一,僚人文化充实了地方志的文化内容。方志将僚人的服饰、建筑、丧葬、信仰等独特习俗纳入记载,使綦江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得以更加立体、完整地呈现。这些记录不仅保存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也为后世了解这一古老族群提供了第一手文献。

第二,这些方志记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僚人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如通裙与泰、老、傣等民族服饰的渊源关系,竖棺葬与崖葬等独特葬俗既展现了自身文化特质,又折射出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区域民族关系和文化演变提供了不可替代

① (明)江朝宗:《重庆郡志·南川县·建制沿革》(残本)。

② (清)戴纶喆:《四川綦江县续志》梓人林子荣谨刊,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秋。

的实证依据。

第三，僚人文化的方志书写增强了地方文化认同。僚人文化是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綦江地区深厚的历史记忆。通过方志的系统整理与传播，当地民众得以更清晰地认识本土文化的根源与脉络，从而提升文化自豪感，为文化传承培育内生动力。

第四，僚人文化入志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随着社会变迁，许多传统习俗面临消失的风险。方志作为权威性的地方文献，其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行为。深入挖掘和整理方志中的僚人文化信息，能够为当下的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可靠依据。

综上，僚人文化在方志学中具有显著价值：它充实了地方志的内容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并服务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重视僚人文化的记载与研究，加大保护与传承力度，是确保这一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的重

要途径。

綦江僚人文化是我国西南地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艺术价值。本文通过对綦江僚人文化的系统梳理，在厘清其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方志学意义，为第三轮地方志编纂中如何书写地域特色文化提供了参考。綦江僚人文化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和文化学的学术价值，还涉及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僚人文化在增强地方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加强綦江僚人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系统整理相关文献与田野资料，既是深化区域历史文化认知的学术需要，也是延续民族文化遗产命脉、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作者单位：綦江博物馆）

责任编辑：周怡彤

两路口的跳伞塔

强 雯

重庆老城，从来不缺精彩的故事。只是它们素朴、沉默、徐缓，被人熟视无睹，藏得深，也绕得远。偶或在某一处光亮骤然照耀的地方，比如青砖黑瓦的转角，便会撞见一段石破天惊的历史。

跳伞塔便是如此。灰扑扑的面孔下，藏着一颗滚烫的心。

它坐落在渝中区两路口，真正的老城腹心。两路口向来以“堵”闻名，这名声要追溯到它的身世——旧时此地已是出城分道之处，一路通往成都，一路去往江北。清代，南纪门外的古道经雷家坡蜿蜒至此，与通远门的官道交汇，商贾络绎，车马不绝。待到抗战烽火骤起，此地更成为连接上下半城的交通枢纽，见证了一座山城的蜕变与沉浮。时至今日，要塞依旧是要塞，两路口最出名的，仍旧是它的“堵”。

堵，让人停步；停步，便撞见故事。两路口跳伞塔，跳伞塔两路口，老

辈子都这么念叨，年轻人却未必留意。如今它被几家医院合围，紧挨着大田湾体育场，若非脚下那块刻着“跳伞塔”的石碑，你很难意识到，这是一件文物。

这座塔，1941年10月动工，翌年3月建成。设计者杨廷宝，是近代建筑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有“南杨北梁”之誉。塔身钢筋混凝土，圆锥形，通高三十八米，实际跳距二十八米，底部直径三米三五，顶部收窄至一米五二，下部周长十三米。三支钢臂从塔身伸出，呈正三角形展开，可容三人同时训练。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这样的结构，这样的材料，已算得奢侈。

1942年4月4日，跳伞塔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白崇禧、张治中、谷正纲、于右任等五百余人到场，场面蔚为壮观。中国滑翔总会会长陈立夫致辞毕，于右任开启塔门，回头高喊一声：“塔门已经开了，请全国青年上去吧！”

陈立夫第一个登塔，从顶上抛下木制滑翔机模型和小降落伞，五颜六色，

飘了满塔的喜庆。为作纪念，他写下《陪都跳伞塔记》，刻碑立于塔下。那碑后来移入三峡博物馆，我未曾得见，想来文字里该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慷慨激昂。

杨廷宝设计这座塔时颇费心思。他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彼时国内无经验可循，国外资料也少得可怜，“设计之初，首感困难者，确为参考资料之缺乏”。苏联的跳伞塔仅二十五米高，仅供民众初级练习之用；美国虽有七十五米以上的军用塔，但结构如何，无从知晓。杨先生怕塔修得太高，初学者望而生畏，沮其锐气，便取了一个折中的高度。这个

折中的高度，恰恰体现了一种温柔的教育学：既要让人感受到挑战，又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他将塔身设计成立体圆锥形，为的是“挺秀而坚强”。塔内置螺旋楼梯，塔下铺了细沙，塔身开了采光洞，连混凝土的本色也是有意为之——“作防空之保护色”。

从跳台乘伞降落，无风无雨时，不过四到五秒便到地面。四到五秒，不过深深吸一口气的工夫。可在那个年头，这短短几秒，连着训练场与战场，连着大地与天空。

抗战时期，两路口跳伞塔是培养飞行员与跳伞训练的重要场所。无数青年在此练就胆魄，旋即奔赴机场，驾机升空，与日寇搏命。据说美国飞虎队也有人在这受训。那时，这座塔矗立在重庆街头，想来格外惹眼——它那么高，年轻人从上面一跃而下，白伞在头顶骤然撑开，半座城的人都仰头凝望。

两路口本就是交通要冲，这般激动人心的体育运动在此上演，想必更是人声鼎沸。

二

跳伞塔并非重庆独有的风景。若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你会发现，这种直刺苍穹的建筑，曾是某个时代共同的记忆。



人类从高处一跃而下的梦想，其实由来已久。唐代李白写下“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幻感，而真正付诸实际是在1777年，法国人做过一次大胆的尝试：他们将一只绵羊装入吊篮，从三十五米高的塔顶投下，那绵羊竟安然落地。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塔跳”试验。一个多世纪后的1911年，俄国人克杰尼柯夫发明了背囊式降落伞，现代跳伞运动的序幕才算真正拉开。

跳伞塔的建造热潮，与战争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降兵作为新兴兵种登上战场，伞兵的优劣往往能左右战局。各国纷纷意识到：要想拥有优秀的飞行员和伞兵，就必须从地面训练开始。于是，一座座跳伞塔在欧亚大陆拔地而起。

在重庆跳伞塔动工的那个年代，遥远的美国纽约，另一座跳伞塔也悄然问世。1939年纽约世博会上，一座造型奇特的跳伞塔惊艳亮相，后被移至康尼岛，成为海滨游乐场的地标。那座粉色的高塔，至今仍矗立在布鲁克林的海岸边，虽然早已停止跳伞业务，却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姑娘们降落时的尖叫声，曾在这里回荡了二十余年。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马来西亚吉隆坡塔以四百二十一米的高度，成为现代极限跳伞者的“圣地”。每年十月，世界各地的定点跳伞高手汇聚于此，从塔顶纵身跃下，在打开降落伞前的短短几

秒内，展示各种空中特技。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加州，被称为BASE jump——取自高楼、高塔、大桥、悬崖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它比传统飞机跳伞更危险，也更刺激：跳伞者通常只有一副降落伞，没有备用选择，开伞只能一次成功。从1981年到2010年，全球至少有148人在定点跳伞中丧生。但这并未阻止勇者前赴后继，正如一位跳伞爱好者所说：“你纵身一跃瞬间感受到的自由，无价。”

国内的其他城市，也曾有过跳伞塔的记忆。北京龙潭湖畔也有一座跳伞塔，1955年破土动工，年底竣工，高五十四米，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跳伞塔。1956年，开封建成一座高达八十五米的伞塔，是当时全国最高的跳伞塔，曾培养出数万名空降兵，还作为电影《碧空银花》的拍摄地。成都的跳伞塔建于1965年，高六十一米有余，落成时是成都最高的建筑。每逢训练日，塔下总是围满了看热闹的路人，他们仰头注视着那些从天而降的身影，看朵朵“蘑菇”在空中绽放。那座塔在1984年被定向爆破拆除，但“跳伞塔”这个名字却留了下来，至今仍是成都人耳熟能详的地名。

这些跳伞塔，有的早已消逝，有的尚存于世；有的被列为文物，有的改作他用。但它们都曾见证过一个时代——那个从地面仰望天空、从塔上一跃而下的时代。

三

跳伞，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运动？

从三十八米高处纵身跃下，不过四到五秒的坠落，却足以让一个普通人体验到某种超越日常的东西。那是失重带来的恐惧，更是战胜恐惧之后，骤然降临的自由。

跳伞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训练飞行员。它是一座精神的炼炉。

生死时速！在四到五秒里，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是蜷缩着坠落，还是张开双臂，拥抱天空。这短短几秒，浓缩了人类面对未知时最本能的反应——是退缩，还是向前。每一次跃下，都是一次与自我的对峙；每一次伞花绽开，都是一次对怯懦的战胜。

从1942年到1944年，三万五千人从这里跃下。若将时间延至1946年，这个数字更增至近八万。每一次纵身一跃，都是一次对恐惧的征服。这些人中，有的后来驾机升空，与敌寇血战长空；有的成为空降兵，深入敌后；也有的，可能只是普通市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体验过一次从天而降的豪情。但无论他们后来走向何方，那一次跃下的记忆，都会刻进骨髓。

体育精神，说到底，不是奖牌，不是纪录，而是一种面对挑战时的不退缩，是超越自我极限的勇气，是相信“我能”的那份笃定。它藏在每一个从塔上一跃而下的身影里，藏在每一次伞花盛开的

瞬间，藏在那些仰望天空的目光中。它跨越战争与和平，跨越国界与年代，在每一座跳伞塔下，在每一个勇敢跃下的灵魂里，生生不息。

重庆的这座塔，见证了这种精神的诞生。而今天，当它沉默地立在车水马龙之间，被米兰花的香气环绕，被地铁的人潮遗忘，它所承载的那种精神，却并未消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从战场的冲锋，变成了日常的坚守；从跃下的勇气，变成了低调生存的韧性。

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依然选择向上的人，都是这座塔的知音。每一次对困难的迎头而上，都是一次精神的“跳伞”。

这才是体育精神真正的、永不消失的遗产。

四

如今，跳伞塔被一圈铁栅栏围了起来，显出几分孤独，几分疏离。四周种着幽然繁盛的米兰和小雏菊，花开得正好，白的白，黄的黄，浓郁的香气一阵阵飘来，绕塔而行，沁人心脾。塔下立着一块碑，写着“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归属于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是的，它在大田湾体育馆一侧，是体育精神的一枚徽章。

实际上，跳伞塔所在的这片区域，在抗战时期还远未形成后来的体育中心格局。据老辈人回忆，当时大田湾还是一片山沟。直到1950年秋，在贺龙的主

持下，大田湾人民广场工程动工，上万名市民和机关干部参与义务劳动，硬是用双手推平了跳伞塔旁的山坡，将土方填入沟壑。

1955年，重庆市体育馆率先建成。这座占地1.8万平方米的场馆，主体建筑三层，可容纳4425名观众，至今仍矗立在大田湾体育路。次年2月，占地近10万平方米的大田湾体育场竣工，成为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场。至此，跳伞塔、体育馆、体育场三足鼎立，两路口才真正成为重庆的体育中心。

有意思的是，跳伞塔虽建成最早，却像一个沉默的先行者，独自伫立了十余年。2000年，它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一旁的重庆市体育馆也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如今，这座铅灰色之塔仍静立在体育馆旁，像一个沉默高人——它见过战火中的重庆，也见过这座城市体育事业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五

离塔二十余米便是两路口地铁站、

公交站，进出站的人流，一波一波涌来，又一波一波退去。大多数人从塔边经过，头也不抬——它实在太像一根烟囱了，灰扑扑地戳在那里，与世无争。

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偶尔会停下来，站一会儿，看一会儿，然后缓缓走开。他们大概还记得这座塔年轻时的模样，记得那些从塔上一跃而下的身影，记得伞花在空中盛放的刹那，记得头顶飞机轰鸣而过的巨响。那时它叫“陪都跳伞塔”，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也是远东地区最高、设备最好的跳伞塔。

正午的太阳照着塔身，照着那些斑驳的混凝土，照着铁栅栏上锈迹斑斑的铁锁。这座石头砌成的塔，见过战火，见过热血，见过无数年轻人从它肩头跃向长空。如今它只是低调地立着，被花香包围，被高楼包围，被遗忘与偶尔的记忆反复擦拭。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那些与它相似的塔，也正以各自的方式，诉说着一如既往的勇气与自由。

（作者单位：红岩杂志社）

责任编辑：张莉

一座千年古城的搬迁始末

陈朝权

坐落在长江北岸的原丰都县城是一座千年古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自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单独设县起，已有1900多年历史。因三峡工程建设需要，这座驰名中外的古城由长江北岸搬迁到了长江南岸，其搬迁历程鲜为人知。笔者在丰都县工作期间，曾参与丰都县城市搬迁建设指挥部筹建，担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了解丰都县城搬迁的点点滴滴。时过境迁，当年的老城已经变成了如今的现代化城市。今年元旦期间，置身于美丽的丰都新县城，城市的热闹与自然的宁静诱发我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引发笔者把丰都县城搬迁的这段历史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一、老城留下的乡愁记忆

丰都旧县城，俗称“老城”，地处长江北岸，背靠名山和双桂山，古称丰民洲，周时为“巴子

别都”，东汉建县以来，历为县治所在地，曾有三三次短暂迁徙。明末清初，连



1999年丰都旧县城商业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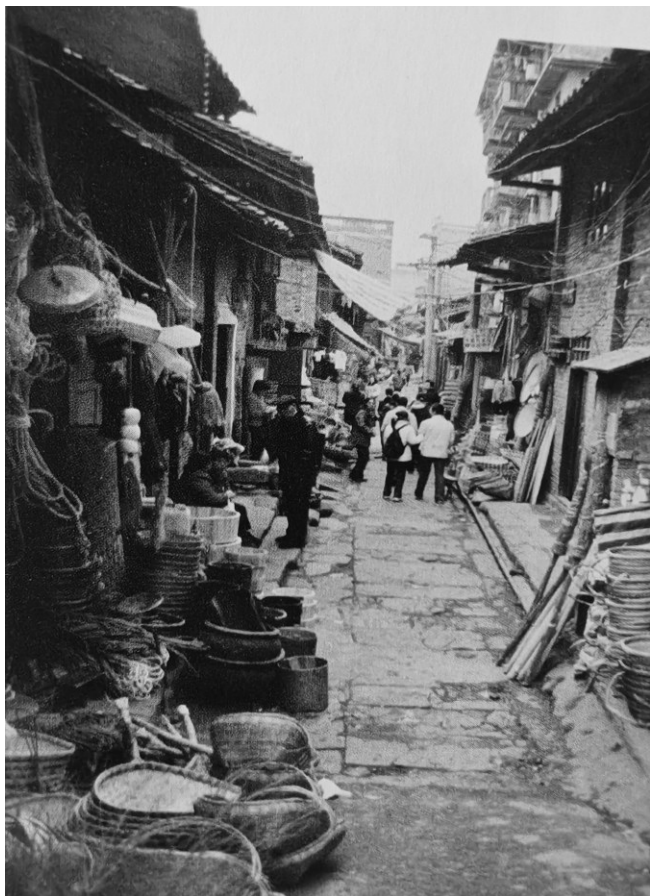
年战争，官署民舍被毁，县城荒凉，草树丛生，县署暂迁高家镇。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知县商起予在故城宣化门重建县衙。清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长江洪水来袭，县城被淹，城墙毁塌。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知县马佩玖组织民众在傅家堡建筑新城，县衙迁至新城六口井。后因交通、用水不便，清光绪三年（1877年），知县陆镛主持修复旧城，县署迁回老城。1940年，为躲避日

机轰炸，国民党把县政府迁至麻柳嘴，两年后迁还原处，地址在商业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县人民政府驻地。

古时的丰都城仅有一条河街。康熙《酆都县志》载：“石城高二丈，周六百丈，门五：东南曰宣化，东曰迎恩，南曰会川，西曰阳和，北曰屡丰。明天顺中，知县柴广筑。弘治中，知县李毅、明绅重修。”^①另有资料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知县桂仲拳时县署东南

向，较简朴，其后渐向名山、双桂山方向扩建街房。明天顺四年（1460年），知县柴广主持初建城垣，垒石高6.7米，周长2000米，明末战乱，城廓毁坏。弘治年间，知县李毅、明绅重修城墙，高二丈（6.67米），周长六百丈（2000米），设五座城门：东为迎恩门（又名守智门），东南为宣化门，南为会川门（又名管驿门），西为阳和门（又名大西门），北为屡丰门（又名北门）。另修东水门、西水门、小东门、小西门四道小门。清顺治、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光绪各时期都补修城墙，城内官署、民房、店铺、学校、庙宇逐年增多。

民国初年，修建房舍逐渐由城内向城外发展，但街道狭窄。



1999年，丰都旧县城下河街

① 丰都县档案馆（丰都县地方志编修中心）编：《酆都歷代方志集成》上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5月，第22页。

1929—1931年，驻军首领陈兰亭设马路局，拆除城墙及部分民房，拓宽街道，建成宽6米的平整路面。商业场至公园为主街，宽12米，两旁房屋多为2至4层的砖木结构，一般是楼下开店，楼上住宿。并修建公园、操场、民乐园，修筑甘蔗坝至鹅公堡公路，1935年在商业场立“路政成功纪念碑”。丰都解放后，县城建设得以恢复和发展。全城分为中山路、民权路、统一路、中正路、中城路、民族路、新华路、复兴路、民生路、黄豆路、鸦鹊街、铁匠街。1958年以来，因受三峡工程建设的制约，丰都旧县城建设投入甚少，欲建不行，欲搬不能，县城建筑陈旧，道路狭窄，人车混流，拥挤不堪。到1991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仅有1.12平方千米，建成区人口达33246人（不含农业人口），其人口密度之大，实属罕见。县城设11个街道，即中华路、西门路、平都路、商业路、中山路、东门路、北门路、名山路、上河街、下河街、鸦鹊街。县城街房呈块状聚落，形若关刀，横呈江畔。

丰都老城孕育了闻名中外的“鬼城”文化，是一座集儒、道、佛为一体的民俗文化艺术宝库，曾是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城市的基因里有着天然的福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都庙会”和“水龙祈雨”“木棒槌戏”“龙孔戏牛舞”“楼子山狮舞”等非遗项目，无不承载着祈福纳福的内涵，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05年12月30日，随着旧县

城最后一幢高楼爆破拆除，丰都这座千年古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全部淹没于浩浩长江之下。商业场、鬼脑壳、公园、后坝、丁字街、下河街、甘蔗坝、麻柳林、小西门、河坝等熟悉的地方长眠水底，成为人们仅存于脑海中的珍贵记忆。古城的屋檐下曾飘荡着炊烟与欢笑，低矮的民居曾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温情，都在拆迁中化为尘土，悄然消逝。

二、科学论证新县城选址规划

195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三峡工程被列为新中国水利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1964年5月，水利电力部完成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技术经济论证报告》，报告建议采用两期工程的方案，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大坝。1983年夏，葛洲坝全部机组投入运行。

1987年3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专家咨询会，就三峡工程的坝址选择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会议最终确定了三斗坪坝址方案。1991年3月，水利部和电力部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92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三峡工程汇报。随后，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草案）》。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标志着筹划了近半个世纪的三峡工程终于进入实施阶段。

在此期间，丰都县也积极谋划县城迁建选址事宜。1984年2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会同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渡口市（今攀枝花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建筑勘测设计院、西南勘测设计院、长江航务管理局、四川省地质局、四川省交通厅以及涪陵地区有关部门与丰都县政府共同成立“城镇迁建选址丰都联合工作组”，对丰都新县城选址进行实地勘查和方案对比论证。并明确县城新址选择的五项原则：新址高程在182米以上，有足够的规划用地，有稳定的地质条件，有良好的建港条件，便于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上述原则，对丰

都县新县城迁建地址提出3个预选方案：一是东移至镇江乡杜家坝，二是后靠至新城乡区，三是南迁至旧县城对面的汇南乡王家渡。联合工作组在对3个方案反复实地查勘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论证和分析评议。

杜家坝方案。位于长江北岸，地处旧县城下游6千米，上至观石滩，下至朗溪，前临长江，后靠风岩头。

新城乡方案。位于旧县城西侧2千米，东抵双桂山，西至斗角丘，南临长江，后至王家墓园。

王家渡方案。位于长江南岸，与旧县城隔江相对，上至代家渡，下至龙河口以东蒋家坪，前临长江，后向开阔，属浅丘，地势起伏不大，地形较为完整，环境空间开阔，城市发展不会受到限制，不仅能满足三峡工程低坝方案要求，中坝或高坝方案亦能满足。

联合工作组经过地形、地质、工程建设和发展条件等多方面比较论证，认为王家渡地质条件较好，岩层倾角小，且与坡向一致，岩层稳定，水文地质简单，适于建设。建港条件较其他两址为优。场地水、电、交通条件较好，三通一平工程量相对不大。沿江建城，与驰名中外的“鬼城”名山隔江相望，将吸引更多游客，有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 and 丰都经济的腾飞。因此，决定县城新址选在长江南岸王



1992年3月20日，丰都新县城建设在王家渡奠基

家渡。

1984年4月，县政府委托渡口市规划设计院开始编制丰都新县城总体规划；1988年，委托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参与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和修改调整；1992年，委托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总体规划修编；1993年6月，《丰都城市总体规划》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批后，县政府委托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做王家渡中心区修建性详细规划，1996年6月正式提交《丰都县县城迁建性详细规划报告》。

三、开展新县城建设筹备工作

丰都县城新址确定后，随即开展新县城建设筹备工作。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率领县建委、县移民局等部门负责人到四川省江油市等地考察城市建设先进经验，为丰都新县城建设提供借鉴。

成立指挥机构。在107地质队设立县城搬迁建设指挥部，下设征地拆迁、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处室。从城建、国土、移民、交通、公安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充实指挥部工作人员。他们起早摸黑，清晨到旧县城码头乘坐轮渡到对岸的王家渡码头，再步行去指挥部上班；夜幕降临，又从地质队步行去王家渡码头，然后排队乘船回家。无论春夏秋冬，还是严寒酷暑，大家都坚持日复一日，为新县城建设奉献力量。

实施征地拆迁。丰都新县城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综合平衡、

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合理利用的原则。1991年，县政府印发《关于建设用地实行统一征用的决定》，明确征用土地补偿安置补助标准。1993年2月，县国土局组织人员对规划区范围内的地面附属物、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等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陆续上报四川省政府批准征用。到1998年底，王家渡中心区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拆迁1220户3325人，拆迁房屋95705平方米。1999年8月，县政府印发《丰都县三峡工程库区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征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和安置补偿标准；10月，县移民局出台《丰都县新县城中心区征地补偿及拆迁安置实施细则》。新县城中心区的土地实行统一征用，分期补偿。人员安置采取二、三产业安置、保险安置、民政安置、外迁安置、农业安置、货币安置等方式。至2011年6月，丰都新县城征用土地441.54公顷。

开展三峡移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组织实施。经过8年库区移民试点工作，从1993年开始，三峡库区移民工作转入正式实施阶段。丰都县政府发出通知，全面停止旧城区基本建设。丰都县委、县政府加压驱动，提出“一年整改打基础，二年加劲大搬迁，三年攻关克难点，四年验收保平安，六年任务五年完”的二期移民总体思路，坚持

“建设新城，拓展新区，安置移民”的原则，把城市发展规划和移民安置规划有机结合起来。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加快，丰都县的移民搬迁建设也紧锣密鼓，有条不紊进行，到2005年12月30日，完成县城移民搬迁51813人。^①

四、启动新县城建设

1992年3月20日，丰都县在王家渡举行新县城奠基仪式，拉开新县城建设序幕。当天，第一台挖掘机在王家渡工地发出轰鸣，开始了新县城建设工程的第一铲土方作业。随后，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驻扎在新县城建设工地，风餐露宿，平场地、建堡坎、修道路，技术人员坚守岗位，监督工程质量、督促施工进度，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县城迁建的基础。到2002年底，完成“六横十纵”（六横即滨江路、商业一路、商业二路、平都大道、南天湖路、雪玉路；十纵即峡南溪路、双桂路、世平路、秀才路、名山大道、河北步行街、庙坡路、沙湾路、东升路、龙河路）道路工程项目180个，修建新县城道路44.84千米，面积4.22万平方米。其中主干道宽24~40米，次干道宽18~24米，支路宽6~18米^②，名山大道和

平都大道成为县城纵横的两条风景线。从2003年开始，进一步完善道路、管网、市政设施及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兴建了龙河大桥、寨子沟大桥，加宽了峡南溪大桥。排水工程实施雨污分流，沿道路修建排水主管道连接各小区，至每幢建筑，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累计修建雨污排水管渠87.33千米、防洪堤沟5.19千米。

新县城地处沿江坡地，山丘夹着冲沟，场地平整及护坡工程量大，累计完成平场项目98个，面积327.31公顷，挖土方1011.29万立方米；边坡治理项目34个，治理面积12万平方米；挡土墙及护坡20.68万立方米。^③

水电气等专业设施是居民生活的必要条件。2000年11月，丰都县政府出台《专业设施复建新县城管网工程建设补偿管理办法》，按照“行业规划，补偿包干，结合发展，改善环境”的思路，将复建工程与改善市政设施和市容市貌相结合。水电气实行一户一表。县自来水公司负责供水工程，将水管道接到用户楼下，新县城建水厂3座：峡南溪水厂日供水3万立方米，郑家院子水厂日供水0.5万立方米，北岸水厂日供水1.2万立方米。县电力有限公司负责供电工程，将

① 丰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丰都县志（1986~2005）》，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95页。

② 重庆市丰都县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丰都三峡移民志》，2014年1月，第299页。

③ 重庆市丰都县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丰都三峡移民志》，2014年1月，第298页。

供电线路安装入户，完成电缆沟开挖8.21千米、电缆铺设17.25千米，架设10千伏及以下架空线119.4千米。县天然气有限公司负责供气工程，移装到安置区用气户内。丰都旧县城使用天然气较早，县城南迁后，新县城所用气源需从北岸引到南岸。修建北气南调输气管道38.1千米。2000年1月开始新县城供气工程建设，2002年12月竣工，完成供气管道70.9千米。县电信局、县移动通信公司、县广播电视局共同负责电讯工程，形成新县城通信网络。完成地理主干通信电缆37.95皮长千米、弱电通信管网230.82孔千米，接通每家用户。完成有线电视地理管网4.3千米，铺设光缆17.93千米。

（二）推进移民迁建与开发建设相结合

据1992年淹没实物调查，县城淹没涉及企事业单位200个、工厂51家、居委会11个、居民小组96个，直接受淹人口33791人，受淹房屋112.37万平方米。^①

丰都县根据经济发展、城镇总体规划现状及发展战略，结合移民搬迁要求和城镇发展历史文脉，按照把县城规划建设成为“滨江旅游文化名城和休闲度假胜地”的城市定位和“蓝天绿地、青山碧水、红瓦白墙”的总体格调，以及“一桥相连、两岸发展、沿江开发、一城

两镇、带动农村”的发展新格局，本着“节约用地、合理布局、功能齐全”的原则，形成规划迁建人口规模50792人，用地规模355.54公顷。2006年，县城搬迁人口调整为51838人。^②

丰都新县城建设坚持开发性移民方针，实行移民迁建与开发建设相结合，拓展城市建设，移民周转房拔地而起，开发建成朝华公园、滨江公园、宏声文化广场、宏声艺术宫等公共设施和世纪金都、阳光上海城、宏声家园、奇正佳苑、恒安第一江城等一批商品房。

新县城房屋建设主要集中在1999年年底至2002年，县城居民以居委会为单位组团建房，机关单位的住宅与办公业务用房相分离，组成若干办公组团和住宅小区划地建房。经过一年启动、一年攻坚、一年决战，3年共建各类房屋300.09万平方米，房屋均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混合结构，楼层一般为8层，皇都大酒店、电信大厦、建设银行大厦等一批标志性建筑为城市增添光彩，展现出现代化城市的风貌。2005年，新开工商品房面积8.58万平方米。

五、有序实施县城搬迁

实施移民，交通先行。移民之初，丰都没有长江大桥。为加快县城搬迁进度，丰都县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建成飞跨南北的丰都长江大桥后，抓紧

^① 重庆市丰都县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丰都三峡移民志》，2014年1月，第306页。

^② 重庆市丰都县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丰都三峡移民志》，2014年1月，第291页。

建设与王家渡紧密相连的王（王家渡）高（高家镇）路、王（王家渡）龙（龙驹）路等沿江公路，县城的移民搬迁得以快速推进。2001年9月8日，在旧县城体育场举行5万多人参加的旧县城搬迁仪式，开展万人见证移民搬迁签名活动。仪式结束后，21辆满载办公用品的大卡车，浩浩荡荡地驶向新县城，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及53个县级机关入驻新县城党政办公大楼，标志着千年古城大搬迁的帷幕正式拉开。2002年6月28日，丰都旧城居民大搬迁正式启动。这天，晨光初现，薄雾未散，旧县城平都路、北门路搬家车辆往来不绝，邻里间互相搭手，首批居民将满载记忆的旧家具一件件搬上货车。货车出发前，一位老年居民站在巷口，眼神扫过承载了数代人生息的老街巷，继而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楼房上，低

声自语：“再见啦，我的房子。”

2005年12月30日，随着旧县城最后一幢高楼拆除，千年古城完美谢幕，全体移民过江入住新县城。前后经历了10多年，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新县城建设经过大拆迁、打基础、大建设后，一座雄伟壮观的崭新县城屹立于长江南岸。

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让长江之水奔涌起新的乐章，也为古老的丰都带来生机勃勃的新面貌。如今，一座依山傍水、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滨江城市矗立在王家渡这片风水宝地，正以其独特魅力托举起丰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单位：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莉

身边的铺递

叶仁军

老家有一个高尖铺。高尖铺位于水口镇高尖村。我的家在水口镇长冲村。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走！去高尖铺。心里就想当然，那里必然是繁华之地。不然，村民们怎么就常挂在嘴上。那里，是不是如天上的街市，有糖果铺、裁缝铺、木器铺，想有尽有。当然更应该有铁匠铺，因为，我的爷爷是村里远近闻名的铁匠，在自家院子里开着一间铁匠铺。全村的村民都去那里打农具和铁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年四季，没有冷清的时候。想必，人们嘴里念叨的高尖铺可比我爷爷的铁匠铺热闹得多才对。

当我读中学的时候，去了区里双江中学。常常顺着山间大道，从长冲村到水口村，经过高尖村，翻过万家大梁，就到了三坝乡的龙溪村。走上在山间盘旋的更生大堰，一路山路崎岖，一会儿山顶，一会儿沟底，当走出轿顶山的尽头，就是双江镇的稻场村。顺着山梁往前走，山梁的尽头是一个土山坡。那里视野开阔，四处都是坡地、梯田与河谷，

远处就是从开州流淌而来的汤溪河，云阳县除长江外的四大支流之一。河流的某个转弯处就是我们就读的学校——双江中学。在接近目光尽头的地方，有一条山梁叫龙脊岭，岭外就是浩浩荡荡的长江水，从青藏高原，穿越崇山峻岭，流经我们的家乡，直奔大海。可惜，这个土山坡有一个很俗的名字，狗屎包梁。每到这个地方，我都要坐下来，歇一口气，打打望。一个少年背着一周的口粮，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这里已经精疲力竭。其实，这里就是一个石谷子坡，除了两块土质很差的坡地，两株无法长高的桐子树外，什么都没有。可这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群山，还有很长很长的长江，给人无限的遐想。从狗屎包梁出发，则一路向下，直插河谷，经过爱国村，天宫村，就到了我所读的学校，那是区里唯一的重点中学。这条大路，几十里路程，每周往返，我走了六年，风雨无阻。

当我从高尖村经过，路过一湾梯田时，高尖铺就在大路的对面。我望了很

多遍的高尖铺，并不是我童年想象的高尖铺。它就是一个农家院子，旁边有一个不小的池塘。我有时边走边想，去对面看看。但最后都放弃了。我还要上学，我还有几十里山路要走。终于，有一次我抵御不了内心的冲动，决定多走一段路，去对面看看。结果，大失所望。就是一个农村的普通院落，和我童年去过的很多农村院落大同小异。一个青石板铺就的坝子，周边是高高低低的几栋农房，有的只有一层地基石，也有高达两米甚至更高的青石墙。可是，这个院子连一个小卖部都没有，更别说各类店铺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院子边有几株柑橘树，那在全镇都是少见的。还有一个大池塘，农民在里面放了不少草鱼、鲢鱼。高尖铺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跌入凡尘。现在的高尖铺已入住重庆城乡发展职业学院（高职），成为校园的一部分。

既然连一个铺子都没有，为什么叫高尖铺？没有人告诉我。2021年，我到云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一日，交通局的人给我送来《云阳县交通志》初稿叫我审读。在157页第二篇陆路篇第

二节驿道的内容中发现，明朝初期，云阳境内北岸设有南沱、五峰、巴阳三处驿站。明朝中期设铺，云阳设15铺，其中就有高尖铺。自此，我方才明白，这里曾经是一条驿道。在数百年前，常有快马从这里飞驰而去，给州府或者都城送去十万火急的军情，也或许是送给帝王将相的一方珍宝贡品。

我对家乡的驿站产生浓厚的兴趣。查阅县志，唐代，水陆驿均30里一置。每驿置驿长、驿夫、船夫。县内驿递由县令兼理，县际驿递由州兵曹掌管。水陆要冲，置关津，配关禁，往来需持公



云阳经过高尖铺至开州的古驿道

文，驿使需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元代称驿为“站赤”，分水陆两站，站户系义务劳役。明代，五峰水驿自汤口至安坪，间有东洋、庙矶险滩，编天、地、玄、黄等号船9只，每只船有船夫10名，在龙洞设行馆，馆夫4名，每夫年工银37.5两，共支银3525两。巴阳水驿编温、良、恭、俭等号船7

只，每只船有船夫10名，另设巴阳公馆馆夫4名，每夫年工银25两，共支银1850两。查证旧志释义，巴阳水驿和巴阳公馆所在位置并不是在现在的巴阳镇，而是在原双江镇老街澎溪河与长江的交汇处。

清乾隆二年（1737年），恢复铺递。在云阳境内分设东路、西路、北路三路铺递。每铺设铺司兵3名，配递马3匹。其中，北路有三坝铺、分水铺、高尖铺、黄石铺、高阳铺、渠马铺。根据方位和地名核对，三坝铺应在现在的青龙街道三坝溪村；分水铺在水口镇水口村（原长冲村）分水梁地界，与栖霞镇（原红堰乡）比邻；高尖铺在水口镇老林村



曾经的高尖铺现在的数智森林小镇数据中心

（原高尖村）。整个北路铺递线路从云阳镇（原县城）经青龙街道、栖霞镇、水口镇、黄石街道、高阳镇、渠马镇进入开州（开县）境内，而这条线路也是我到县城求学、工作曾经步行走过的线路。

这些山路驿道在崇山峻岭中时隐时现，古人走过，今人走过，如今却掩埋在荒山杂草之间，行走之人日渐稀少。铺舍、驿道，在一个时期为人们传递着重要信息，把数百里数千里外的事告知它应该知道的人，改变着这个世界，推动着历史发展，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

（作者单位：云阳县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伟

重庆市地方志系统干部素质能力 提升培训班圆满结业

2026年4月17日，为期一周的重庆市地方志系统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宁波大学圆满结业。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徐斌作培训总结。

此次培训，紧紧围绕重庆地方志工作实际需求和志鉴编纂重点任务，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分别授课。课程设置涵盖地方志编纂基础知识、第三轮修志、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镇村志编纂等内容，授课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既有政策解读，又有案例解析，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有效夯实全市地方志干部业务能力，全面提升专业素养，为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培训采取专题授课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组织

学员走进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余姚市横坎头村教育培训基地，开展现场教学。

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还进行了分组讨论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培训内容充实、收获颇丰，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学到了志鉴资料收集、文稿编撰的方法技巧，学习了浙江地方志工作的先进经验。全体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把所学所思、所获所悟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用心打磨精品志鉴成果，凝聚奋进合力、实干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供稿：市志办年鉴工作处）

责任编辑：陈欣如



